



美國外交官眞相

譯魚小予 著爾卡布

行印社版世外中

相真官交外國美

譯魚小子 著爾卡布

目次

前言	一
第一章 我做的情報工作	四
第二章 美國國務院上層的反蘇派	一三
第三章 莫斯科之行	三八
第四章 美國大使館的情報活動	五八
第五章 美國新聞處與美國的宣傳	七〇
第六章 美國大使館的投機商	八九
第七章 爲什麼美國統治者耀武揚威？	一〇〇
第八章 我對於蘇聯的印象	一〇八

前 言

過去的一年引起了我生活上不少巨大的變化。我是一個在美國生長的美國人，我愛我的國家，並且曾經誠摯而忘我地爲它服務過，可是，在過去這一年中我終於決定永久在蘇聯居住，雖然我在蘇聯只生活了兩年，我已經很了解而且很愛這國家了。如果認爲這決定在我是件很容易的事情，那是錯誤的。我對於鼓勵以及反對我採行這個步驟的各種因素作過長久而熱切的考慮。因此我的決定採納贊同我的因素是有着若干深刻的理由的。

有些不友誼的人們將從我私生活中去探究我的動機，可是，除了真理，什麼也都不是的。它們實在是純然客觀的。我作下我的決定，是因爲我已確信美國的統治者們正引導美國，以至於整個世界走向一場可怕的災難。

我得到這個信念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也並不是那些倡言和平的組織與個人所發表的演詞與小冊子的結果。它是我在過去將近三年之間，在華府國務院與在莫斯科美國大使館親

自所接觸與日常工作的結果。在華盛頓與莫斯科，我看到過那些爲美國外交政策負責的美國外交官們如何一步步竭力設法招致世界的災禍。他們的政策現在是而且一向是反對蘇聯的；而按我的了解，蘇聯則曾經而且現在也仍舊在消除他們這種反對世界和平，反對全人類求更快樂與更美好的生活的那種破壞性的努力。

這些美國外交官們一向重視着下列這個事實，即阻止美國億萬富翁們統治世界的目的是蘇聯。因此污蔑蘇聯有侵略企圖，並作爲自己準備反蘇戰爭的理由，正是他們當前的目的。因爲，在我爲國務院與莫斯科美國大使館工作期間，我已確信兩者的高級首長們的努力都爲着這個目的。

事情很明顯，我在默不出聲，盲目地推行國務院與蘇京美國大使館各戰販們的命令，從而令自己對世界人民担負一部分巨大的責任，與發出反對他們這種可怖的活動之間，遭逢着一種進退兩難的局面。要在大使館內作一種抗議，那正同在荒野內呼喊。因此，採行一個更有效的步驟是必需的。這步驟在於令我獲得有效地參與反對戰販鬥爭的機會。爲了做到這一點必須拋棄所有個人的與感情的考慮。我終於就這麼做的。

我向大使館辭了職，而且決定留在蘇聯了，在蘇聯我將竭我能力所及，參與爲和平與世界繁榮的努力。

這本書是我與若干個人廣泛接觸的結果，這些人也就是美國人民所希望能與所有國家，

包括在與法西斯致命危險作戰中爲人類作過無價貢獻的蘇聯在內，維持並發展善鄰關係的人們。可是我在國務院與蘇京美國大使館內所目擊的活動，正好與美國人民的期望形成彰明昭著的對照。我看到達摩克利斯（Tannocles）註：達摩克利斯是叙拉古國教長狄奧尼休斯的侍從之一。有一次他誇張他自己的幸福。狄奧尼休斯便盛筵請他，同時在他頭上用一根頭髮懸了一把鋒利的大刀。）的大刀正垂懸在人類的頭頂，刀口正在逐漸下降，再度威脅着成千百萬的人民。

因此我不能緘默。

第一章 我做的情報工作

我生於賓夕文尼亞州匹茨堡附近的一個大家庭。我的父母像匹茨堡區的許多人一樣，都是來到美洲尋求較好生活的歐洲移民，他們會聽到說美洲是一塊擁有財富，自由與良好機會的土地。

像其他到美洲的移民一樣，我的雙親立即發覺他們實在是被『輸入』來給人剝削的。他們是一些名爲『廉價勞工』的貨品，而且被購買他們的勞力的僱主們待遇得像其他工業原料，像在美國煤鐵業中心用來煉鋼的鐵苗與煤一樣。

移民中有不少曾因不堪可怕的剝削與混亂而死亡，有些比較幸運的就回到了歐洲。另外許多人就畢生充任勞工，往往弄到苦極而死。我的雙親終算靠巨大的出力而活命，而且幸而家裏有不少人做工，在匹茨堡附近一個田莊上維持了一個最簡陋的局面。

我從中學畢業以後，決心不顧所有困難，去受高等教育。當時並沒有供給學生的政府獎金制度，因此當我進匹茨堡大學時，爲了償付生活費與學費，必須做一部分的工。正像美國

大學內大部分學生一樣，我爲了維持生活，在全部入學時間內，都一直被迫工作着。經過極頂困苦而無定的過度工作以及憂慮能否完成學業，畢業後能否找到一個職位的四年之後，我離校找職業了。

最初我在幾個商號內找到些短期的工作，大戰期間進了美國情報局工作。後來我被派在國務院任職，大戰結束時，國務院又送我到莫斯科美國大使館工作。

簡括說，這就是我的生平。這裏除了說明我是赴美的歐洲移民的成千百萬子孫之一，一億四千萬具有許多方面相同背景與經歷的普通美國人之一外，並無重要意義。

在美國家庭，中小學，大學，紐約與華盛頓工作場合所接觸的廣大人群中間，我發現沒有一個人對他們的出身與當前的生活中，沒有困難與不遭受損害的。

歐洲人對於美國人生活的普通概念離事實極遠，他們似乎認爲美國人每人都生活在經濟安定與對將來有信心的情況下，美國的青年人生來都是有照顧與快樂的。

我只有在華盛頓國務院與莫斯科美國大使館期間，才接觸到了上層階級與在受高度庇護的優裕生活中長大的青年，僅少數例外。可是他們與真正美國人生活之間的距離正像我們與其他星球上的人們一樣遙遠。他們與作爲國民大部分的我們相比，實在屬於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

自然，我雖然幾乎有生以來就生活在樸實的境況中，可是我在各方面都比同世代的大部

分年青人幸運。我不像不少朋友與熟識者，他們早年就離開學校，在匹茨堡的煤礦，煉鋼廠，店舖與工廠內工作，而且今天大半依舊在那些礦場，工場，店舖與工廠內，我終於設法受到了高等教育，並獲得了『高尚的』工作。

離開大學之後，我有時在私營的商號內工作，可是這種工作完全不能令我滿意。我發生了一個竭盡我的能力參與反對法西斯德國的戰爭的大希望。就在那時候，我得到一個美國空軍大隊情報部裏的職位，我接受了它。

在這個組織裏，我一度在北大西洋組工作，不久以後調任戰略服務局（OSS）外籍股的職位，該局是美國主要的情報機關。

我的主要任務是仔細研究在美國出版的外國報紙與期刊，特別是斯拉夫文的出版物。我該寫一些在美國各斯拉夫團體，特別是一些進步的團體的活動的綜合評論與報告。我被希冀着在這些報告內，作一些如何利用這些團體，以完成戰略服務局情報任務的建議。

當時我認為我在美國情報機關內的工作，對反對全人類的敵人希特勒主義是真正有用的。我生來憤恨法西斯主義，我認為在情報機關的工作，將是與法西斯禍害戰鬥的最好方法。以後，我發覺了，至少我抱這種理想主義的思想是非常天真的。如所周知，大戰時期美國的情報機關對與法西斯作戰一事並不賣力，而戰後它們採行着一種與德義日以前與現在的一些法西斯情報與反間機關全力合作的政策。

在戰略服務局任職期間，我終於熟悉了美國人稱以『外套與短劍』外號的這個情報機關的歷史，任務，工作方法與方式的一些有趣的詳情。

戰略服務局的主官是鄧努萬（William Donovan）將軍。他於一八八三年生於紐約州的布法羅地方，曾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曾參與德境美國遠征軍的騎兵隊。鄧努萬是個天主教徒，共和黨人，一九三二年曾充紐約州長一職競選失敗的候選人。

從戰略服務局工作一開始的時候，鄧努萬就設法獲得美國政府的信任。他憑着非常狡猾的活動，終於使華爾街的反動勢力對於這個機關也施用了他們的權勢。

他的所以能這麼做，是由於羅斯福其時忙於有關美國作戰努力的一些更重要的事情的緣故，鄧努萬會因此親自委任了一些他那情報機關裏的上層人員。

鄧努萬會邀請了一些他的商場同業，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同伍的退伍軍人，担任主要的行政職位。舉例說：勃克斯登上校（G. E. Buckton），一九一九年鄧努萬與他曾爲美國的法西斯組織『美國參戰軍人團』（American Legion）作過奠基的工作；巨大的進出口公司『夏威夷波羅公司』總經理李却嗣（Atherton Richards）、摩根（J. S. Morgan）、『幸福』雜誌的羅伯（Elmo Roper）、第一次世界大戰『英雄』與華爾街的律師李佛摩（R. Livermore）等。鄧努萬還邀了邱吉爾的一位表兄弟蓋斯特（Raymond Guest）、百萬富翁雷昂（

T. Ryan) 之子，反動的『紐約太陽報』老板狄華特 (Bill Howard)，梅隆豪門後裔保羅·梅隆，及前沙俄王子與將軍奧波倫斯基 (Boris Obolensky) 參與戰略服務局工作。奧在參加戰略服務局以前，生活十分狼狽。

鄧努萬在創立戰略服務局之後不久，就派出了他的代表到海外去搜集各國關於經濟情況與政策的情報，其中不少以報紙通訊員的身份出廠。

法國覆敗後，鄧努萬曾訪問法國，設法查明它潰敗的原因。

鄧返美後，就自信地向美國政府報告，法國的失敗並非由於『第五縱隊』，也不像如同布立特大使所報告的由於法國共產黨的活動，而是由於羸弱的軍事領導以及法國對於現代戰爭的全無準備。

以後鄧努萬訪問了巴爾幹各國與中東，他也訪問了倫敦，開羅，雅典，貝爾格勒特，索非亞，安哥拉與耶魯撒冷。他作這次旅行是爲了爲美國軍界搜集特別情報，並視察在這些國家內美國各情報機關的工作。

鄧努萬在阿爾及爾時，曾與魏剛將軍作過一次長時間的商討，因而完全熟悉了北非的情勢。因此事實上早在一九四〇年底，美國已經開始了他們在北非的軍事行動的準備，甚至在在那時候已經通過美國情報機關建立了與北非法國軍事當局的聯系。

在一九四二年九月，鄧努萬曾與簡稱 G. O. S. 的英國經濟作戰情報處的首長，在倫敦作過

一次關於在軸心國家與軸心佔領地區散佈秘密宣傳材料的商談。當時對於宣傳的散佈達成了一個協議，這宣傳旨在使在這些國家的親盟國分子得到精神上的支持，但同時不准他們在有利於英美之時日以前發動對德人的暴動。在這些談判中，被佔領國家人民的利益是最少受注意的事情。

戰略服務局有鑒於歐洲人民對法西斯主義的憤恨，它與這些國家的地下抵抗團體建立了聯繫，在這些組織裏滲入了它自己的特務，以便美國情報機關在戰後利用它們。

幾個月以前，美國情報機關送給法西斯西班牙的反間機關一張二次大戰期間在法國參加反德抵抗運動的西班牙人的名單，這事令我吃驚異常。美國以這樣的方法報償這些游擊戰士給予的協助，真令我感到巨大的羞耻。

我在戰略服務局內工作很快就發覺了這機關主要的情報活動，並非對付德國，而却是對付蘇聯的。

我根據我許多的觀察，可以明確地說，大戰時期美國情報機關的首長們會利用美蘇之間存在的盟國關係，派遣職業的情報官員滲入了蘇聯境內，進行反對這個盟國的情報工作。這些情報官員會以各種偽裝派往蘇聯，例如充顧問，二三等秘書，參贊以及大使館書記，充當軍事供應使節團與軍事參贊辦事處官員與僱員，還有假充美國報紙、雜誌與廣播公司的廣播員，或担任租借設備裝配工作的專家。

美國情報機關活動的反蘇方針已由下列事實證實：在美英聯盟反對法西斯德國的大戰期間，戰略服務局內最大的部門是俄羅斯司，它由哥倫比亞大學歷史教授羅賓森主持，他在美國被認為偉大的蘇聯問題專家。

俄羅斯司內設有專事搜集關於蘇聯工業與軍事生產量，運輸，人力，國民收入，對外貿易，農業等情報的組。

戰略服務局一開始就認為反蘇的情報工作最為重要。大戰將結束時，戰略服務局認為搜集關於蘇聯及其外交政策的情報，關於對蘇友善的各民主國家的情報最具有重要意義。

我確實知道戰略服務局駐倫敦的代表們，會與英國希臘與比利時的情報官員結有密切關係，他們並且徵僱供給情報的特務，這些情報不僅是關於敵人的，也有關於盟國的，而其中特別以蘇聯為主。

舉例說，戰略服務局駐重慶的代表們就搜集關於蘇聯的情報，一九四二年戰略服務局的一位特派員白衛軍俄人I·托爾斯泰會派往西藏，研究毗連蘇聯的地區，並在這些地區策劃反蘇的情報活動。戰略服務局的人員會由伊斯坦堡派遣特務前往德國與蘇聯。

在有些有利於美國統帥部的情況之下，戰略服務局的人員會在德國佔領的地區策動擾亂，而在次數更多的別的情況之下，他們有意地阻碍抵抗運動的發展，並使它導入於對美國戰略上有利的途徑。我確實知道戰略服務局在進兵歐洲日以前會故意阻碍法國抵抗運動的暴動

。另外在暹羅，抵抗運動的領袖們已作了發動反對日本佔領軍的大暴動的一切必要的準備，但在暹的美國人員也採取了類似的態度。

戰略服務局會由自動入伍的新兵中組織若干別動隊，在許多情況之下，這些小隊在歐洲被佔國家與北非做得好像是抵抗運動的『組織者』，實際上他們在那裏創設一些反動的地下組織。他們搜集情報材料，並積極參與反對人民陣線的游擊隊，特別是法國共產黨的鬥爭。他們專門支援戴高樂的地下組織，戴是毫無疑問地推行所有美國人的命令的。

因此戰略服務局不僅在德軍戰線之後搜集情報，而且在歐洲各淪陷區打擊進步勢力。類似的別動隊在日本也竭力攻擊進步的勢力。

二次世界大戰之初，在美國留學而最受信任的暹羅學生中，曾被選出一些新兵，他們被送入戰略服務局所設的種種情報訓練班，教以無線電通訊，破壞，與游擊戰爭的戰術。後來這一群人通過秘密的途徑，進入暹羅，並設法滲入抵抗運動的統帥部，奪取它的控制權。這做法使這一群人利用抵抗運動，完全爲了推行美國情報機關的命令。

大戰期間，美國政府與蔣介石會訂有一個特別的協定，此後就有一個中美的情報機關在中國創辦起來，這機關叫『中美合作社』，該社的活動是受美國戰略服務局指揮的。

歐國情報官員們會獲得蔣介石政府充分的合作，一個美國海軍部的文告會說起，兩國情報機關如此密切合作，歷史上尙無先例。

我可以證明下列事實，即兩情報機關的這種合作一直延續到現在，美國情報機關至今利用着中國情報機關進行其反對蘇維埃遠東的工作。

我在大使館工作期間，知道莫斯科中國大使館的情報官員，正是在蘇工作的美國情報官員們的出力助手。

因此我們看到了那個原來爲了有意義的對德戰爭而創設的情報機關，如何在戰略服務局反動的首腦鄧努萬，以及他那些華爾街的朋友們領導之下，變成了反動的巢穴，它致力於訓練反蘇的情報以及其他秘密工作的人員。在戰略服務局人員活動的一些國家內，它總受着那些最反動的分子的支持，他們對蘇聯，進步與民主正抱着同等程度的仇恨。

大戰期間，鄧努萬及美國其他情報機關的首領，都把盟國與蘇聯的關係當作一種純粹的形式，必要而非誠懇的。他們企圖利用其時蘇聯人民遭逢的艱難與困苦。他們曾不耐地等待蘇聯的削弱，希望大戰之後，他們能使這個大國屈膝，可是他們是痛苦地失望了。

雖然如此，他們的失敗並沒有令他們受到什麼教訓，他們現在還存有這一期望。顯然他們並沒有從希特勒與法西斯德國造成的教訓中得到什麼益處。

第二章 國務院上層的反蘇派

美國政府各方面都很清楚，特別是美國駐蘇大使館的人們很清楚，蘇美之間的事務幾乎是一小群美國職業外交官專有的財物。

自從一九三三年美國大使館在莫斯科設立以來，這一群人，或者說這一派，設法在國務院內佔有了起決定作用的發言權。自然，他們也必須與不屬於他們一類的一些國務卿與駐蘇大使們商量商量。

可是這些『蘇美外交的獨佔者們』對國務院與美國駐蘇大使館的人事安排具有完全的控制。除極少幾個時期外，他們一向能在所有各個主要問題上施行其反蘇的方針，只有一些較小的事件才有例外。

特別是現在，這一派仗着密切的友誼關係，以及更重要的互相便於私利的關係強固地聯結在一起，它佔有整個外交部門與國務院的重要職位。

這個『美蘇外交獨佔集團』的職員們又以相同的政治看法而緊緊地聯結在一起，他們都

屬於美國外交部內一個整個兒邪惡的反蘇集團中極端反蘇的一翼。他們都認爲一場反蘇的大戰必須引起，這是出於上帝預先注定的。

我自己認識不少這些人，在他們中間有幾個人底下做過工作，並從另一些深切地知道他們的人口聽那些關於他們中間另一些人的事情。因此當我要說到他們的政治見解以及他們一般情形時，我知道我該說些什麼的。

在美國駐蘇大使館時，我像其他的大使館僱員一樣，曾與這些「蘇美事務的獨佔者們」有日常的來往，因此我能很清楚地了解他們。

我愈明瞭他們，對他們這一組織的作爲愈加厭惡。由於我注意於這個集團的工作，我會故意設法去研究他們。我可以說我知道了許多有趣的事情。

如果我能把我的知識，即使是一部分，傳達給一般民衆知道的話，我想也許就會使全世界一般普通人民，都更清楚於爲什麼美國對蘇態度如此敵視的原因了。

當一個現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和平人民，對於國事發展的情況與原因完全淡忘時，該國少數位居要津的官僚與代表資本主義金融利益的統治者群兩者利益上的勾結就推動着使國家不可避免地走向戰爭與毀滅的帝國主義政策，美國國務院的反蘇派就是這種政策如何運用的明白的例。

我可以確切地說，這是極少數人反對世界和平與國際間友誼的一個陰謀：

一小『幫』外交官控制着一個大的強國與另一個大的強國之間的關係。這一『幫』覺得它巧妙地利用其影響，足以慢慢地毀壞這兩個國家間的關係。這兩國間的關係愈壞，這『幫』人的地位也就愈加重要。這『幫』人得到了昇遷，担任着重要的職位，因為他們已經說服了他們的同事，與這個特別的國家間的關係是一個需要特別知識，訓練與經驗的『特殊』問題，而這種特別知識，訓練與經驗是只有他們這一幫人才有的。

這是一個邪惡的圈子。這『幫』人使用它日益增大的權勢，更周密地去毒害與破壞與那另一大國間的關係。

如果這種做法不予阻止，那末戰爭是不可避免的，由於這一幫人夢想着佔領地區有利可圖的買賣，他們的人都歡迎戰爭。在他們的思想中，他們已經預先假定了他們的國家的一場『軍事勝利』了。

不消說，除非事情有利於另一些更大的勢力，這一群政棍與反動派也不能隨意活動的。這幫人在那有關的較大勢力的面前，須有效地完成它自己的目的，同時，它的成員們要成爲那些較大勢力的意志的理想執行者。

這是國務院內『蘇美事務獨佔集團』一般活動的一個概貌。至於這個『獨佔集團』所服務的較大勢力，就是以華爾街爲代表的美國資本主義。對蘇的敵對行動是爲着美國這些金融家的利益，這個『獨佔集團』的行動就是爲着配合他們國家軍事化，成立一個法西斯的政權

與對蘇作戰等計劃的；詳情與實況如下：

誰是美國國務院與外交方面『蘇美事務獨佔集團』的領袖與要角們呢？

韓特生 (Roy Henderson) —— 他是『獨佔集團』裏的老人，雖然一九四三年以來，他的工作與蘇美關係無關，但是一直到最近他還設法保持着『獨佔集團』事務中的一種決定性的發言權。

韓特生曾被知道他的人們形容爲一個冷漠而無趣味的中年人。他的同事們雖然尊重他的地位，顯然仍舊認爲他完全是一個庸人，僅一方面例外，他具有一種行施人事陰謀的非常才能，同時恰配着一種掩蔽這種才能的外貌，它使得並不深知他的人們還以爲他是一個誠實而坦白的人。

韓特生一向的成功不小，實在並非由於他的什麼才能，而是由於他的陰謀天才，加上他就業開始就選中了而迄仍騎着的一匹好馬。

韓特生在國務院以反蘇事務與陰謀專家的地位起家，而且一直到現在他還存留在這一方面。

他與蘇聯的初次接觸遠在他被派任外交工作以前。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征兵執行時，韓特生像美國其他一些役齡的青年人一般，進了紅十字會躲避。這是逃避抽征與兵役雖然相當明顯而確實有效的一種方法。紅十字會的大

門爲某些因種種原因而不願打仗的青年——其中大多是懦夫——打開着。其時也許韓特生還沒有聽說參加美國外交工作是比较紅十字會更有效的逃避兵役法。

事實上，反蘇派的人從來沒有一個一定要打仗，並非出於偶合。如果他們必須作戰，他們對於挑起一次戰爭的想頭也就不會像現在那樣熱心了。可是現在他們把他們那種政策所必然導致的『骯髒工作』交別人去執行。他們用不着上前線。他們不用在戰爭中受傷或戰死！

韓特生最初見到蘇聯，在當紅十字會代表的時候。當時紅十字會這組織與現在一樣，是與美國外交與美國情報工作方面密切聯系的，它爲那些未來特務在年青的蘇維埃共和國覓找工作。

當韓特生認識了蘇聯，他就看到正如美國的投資家所說的，這裏是塊『好地方』。他預見到——這事情並不需要老手——在美國政府機關內，『俄國問題專家』——也許更適當些他們該稱爲『反俄』專家——一定是個特出的要求。

由於心裏有了這個念頭，他曾請求並如願地被派充外交工作。韓特生在擔任過幾種爲所有初任外交官一定担任的幾種普通職務之後，被派到波羅的海國家，担任直接與蘇聯事務有關的工作。

他仗着簡單的活動就成爲反蘇情報組織內的一位要角。早在美蘇正式關係建立以前，韓特生就說服了國務院內主管蘇聯事務的高級官員，要他們相信他是他們可信託以『蘇聯事務

』的人，他並使她相信他應當被當作外交方面主要的『俄國問題專家』。

他被召返美，準備與蘇聯恢復外交關係，按這些人的看法，這事情是不可避免的。

羅斯生所建議的準備步驟之一，是立即選擇一群『出色』的青年，訓練爲『反俄專家』。這建議爲他的上司所接受，韓特生選了三個年青的外交官員進行訓練。

由於這幾個人蘇美外交上至今仍屬重要，提一提他們的名字是有意義的。他們是肯南 (Gordon Lorman)、波倫 (Chief of Protocol) 與裴琪 (Robert Page)。

肯南在美蘇建立外交關係以前，已經體味到了國務院的反蘇政策與某種在布爾喬亞的波羅的海國家的『思想訓練』。波倫曾被一度派往布拉格，裴琪被派駐哈爾濱，其時哈爾濱像布拉格，巴黎，柏林，里加等地方一樣，是反蘇維埃政權的白衛軍陰謀的中心之一。

肯南在担任這些職務之後被派往柏林學習俄文，裴琪與波倫被派往巴黎，目的也同。

值得注意的是，其時這些官員被派往莫斯科在蘇人中學習俄文無疑是可能的，可是他們被派到那些中心，在那些白衛軍分子中間學習。

這時就是國務院『蘇美事務獨佔集團』的開始。在建立美蘇外交關係幾年以前，這獨佔集團就經過仔細計劃與組織，其目的就在於一開始就獲得這方面外交上的完全控制。

事情很明顯，這種做法可以適當地說是早在兩大國外交關係正式建立以前，就加以毒害的陰謀。國務院這批反蘇領袖以韓特生爲首，以肯南，波倫與裴琪三人爲輔，從那時候開始

擴展一直到今天。那時候它只包括不到一打的年青外交官員，作爲新產生的『反俄專家』的年青配角約半打之數。

在一九三三年美國大使館在莫斯科成立以前，韓特生自己一直留在國務院內。在國務院期間，他打下了華府經辦蘇美外交的組織的基礎，這就是從那時開始的東歐司。

一俟外交關係建立而美國大使館在莫斯科設立之後，韓特生立即設法使他自己與他的一些副手前往蘇聯。

韓特生與業已在柏林與布爾喬亞的波羅的海國家完成訓練的肯南，確實組織起大使館來。他們選擇美籍與蘇籍的僱員，按排大使館的機構，並策劃大使館的工作。

美國大使館於一九三三年在莫斯科建立。於是原在里加進行的主要間諜活動就移到了莫斯科，但里加並不放棄，仍作爲一個諜報中心。

雖然其時一部分諜報活動是在美國駐莫斯科的軍事代表手中，可是大使館的人員也担負着一個重要的部分。

從一開始，韓特生就在大使館四周造成了一種陰謀的空氣，一直延續到現在，而且它被美國大使館傳播到了駐在莫斯科其他國家的使領館。

韓特生利用每一個可能的機會進行反蘇活動。他與他的外交官員會企圖在蘇聯人中潛藏僱諜報人員。

每次這種特務被蘇聯當局捕住了一個，韓特生就跑遍莫斯科其他使館哭訴『蘇聯當局的殘暴』，大掉其鱷魚之淚。他送國務院以周密的報告，也以類似的虛偽腔調措辭。自然，由於很少人知道這些被捕的人們的實際間諜活動，同時那些美國人自然表示沉默，大使館的那些普通職員因此受韓特生的麻醉，相信無論那個俄羅斯人和美國人一談話，第二天就會被捕。許多現在到莫斯科的美國人都還相信這種說法是真的。

韓特生會親自與每一個新到大使館的職員作一次『眞心的』談話。那位新來的美國人被告以他四周將被蘇聯間諜人員所包圍，被告以某些事例，有些是眞的，例如某些韓特生的特務被捕，有些完全是虛構的。當時他被告以不久他本人一定有當蘇聯特務的少女打電話找他。他經過如此多方面的警告，如果他是天眞的話，往往在走出韓特生的辦公室時神經就大爲錯亂，而且每次他外出散步時，一定不斷回頭張望，看看是否有人跟他。

韓特生爲了使他的談話見效，往往故佈疑陣，攪一些『怪電話』，由那些奉韓特生之命的人去打，而那個打電話的少女往往表現對於接電話的青年具有某些不尋常的知識。於是這個青年就驚訝到半死，一連幾星期會在大使館裏說：『你知道嗎，我到這裏一天之後就有位少女打電話給我，她知道我的小名，我在美國的家鄉。』他的推斷是打電話給他的俄國『間諜』一定得有充分的背景情報。他於是陷於恐懼之中，往往要一個長時間才能恢復過來。

這種『訓導』顯然仍在進行，而且不是沒有效果的。

由於韓特生的一些外交官員們受命在一些下屬僱員面前不斷談論『怪電話』與蘇聯公民的被捕，美國大使館的陰謀空氣也就更加厲害了。

這些題目供給了大使館內大部分談話資料，因而在那裏工作的每一個人——至今情形仍然如此——開始感到連他的影子也監視着他。確有幾個美國人由於深受韓特生的『鬼故事』與『神話』的驚駭，終於必須送回本國。有些人送進了療養院，以療養他們神經上的變態。爲了恐怕有人對我關於韓特生的故事的真確性或許有懷疑之處，我應該再補充以其時在大使館內的兩個美國人告訴我的如何奉韓特生之命恐嚇那些新來人的情形，我覺他們當我們的面談論全部事情時一定正酒醉胡塗，要不然是不會說出來的。他們對他們所謂『實在的笑話』哈哈大笑，而且譏笑那些被他們以這些存心不良的辦法所騙的人們。

韓特生在大使館內施行了這種調查制度之後，被召回國務院主持蘇美外交事務。從一九三八到一九四三年中，他擔任這職務歷時五年，他的頭銜是東歐司副司長。

蘇德戰爭最初，韓特生出了一次錯誤，會嚴重地影響了他的境遇一個相當時期。

他像美國政府的其他一些『俄國問題專家』一樣，受主觀願望而非客觀事實的領導，會預言蘇聯將在幾個星期之內被德國所擊潰，美蘇兩國雖有反德作戰明顯的共同利益，他力言反對兩國建立較密切的關係。

事實上白宮是被迫直接干與蘇美事務的。白宮援救了這種情勢，改正了不然將損失成百

萬美人生命的不可補救的錯誤，這錯誤將不可避免地會在最後擊敗法西斯德國中起重要作用的美蘇合作延遲幾個月以至幾年。

韓特生的竭力破壞美蘇合作，惹怒了白宮，因此他被調任爲美國駐巴格達公使，流放到伊拉克。

可是韓特生並不五神無主，他對什麼事物仍有充分的應付。他到了天方夜譚的發源地，像阿拉亭 (Aladdin) 一樣，取出了他自己的幻燈。一盞變，就出現了一個魔鬼，韓特生在伊拉克的發現也就是他在各處的同一般發現——『紅色的威脅』。

無疑的，如果韓特生被派充駐南極美國使節的話，他在一年之內也會發現在那些企鵝中間也有一種『紅色的威脅』的。

韓特生關於巴格達『共產主義的危險』的發現又使他久受國務院那些權貴們賞識，因而不久他就被調回國，主持國務院的中東司，在這裏他又有一個『發現』，『紅色的威脅』不僅在伊拉克存在，在整個中東也都存在。

韓特生在任期間就策動着爲希臘民主運動積極作戰的所謂社魯門主義。

韓特生又發現使石油不僅可以使機器滑潤，也可以使國務院滑潤。韓在中東的一些美國石油公司的直接影響之下，規劃了國務院另一個動作——對巴勒斯坦政策的變化。這變化使美國要求改變它自己提出來的聯合國決議。

當我寫作文時，據說韓特生已被派任美國駐印度大使。可以預料到的是在半年左右期間，國務院得韓特生先生的協助將獲得一個聾人聽聞的發現，即『共產主義威脅着印度』總之，韓特生的生涯沒有完結，不過最近沒有聽到他的事情而已。

肯南——國務院內時常說起肯南，說『他比美國任何那個更清楚於俄國的事情』，他曾在爲訓練在俄國工作的德國情報人員的著名學校內——東歐學院——內學習俄文。

這也許是一個全部經歷表現關於俄羅斯的『智識』不得自莫斯科而得自柏林的人的傳記中一段典型的事實。

肯南說俄語帶有明顯的外國重音。他說德文就沒有任何重音。

甚至在一九三四年肯南到莫斯科之後，他依舊不在他四周各處進行的社會主義建設中而在其他方面去尋覓他的『靈感』與『知識』。國務院內大家都知道，當肯南在莫斯科美國大使館工作時，他最好的一些朋友是德國大使館的外交官與軍官，他從他們那裏知道關於俄國的事情，通過希特勒黨人的眼鏡去看他被派研究的國家。

因此這位『俄羅斯問題專家』對於蘇聯的了解也從不超過他的教師們，而且現在正設法幾乎完全重複這些法西斯軍官，外交官與間諜們不幸的錯誤，這些人在那時候還在夢想與設計如何在三個月中征服蘇聯。這些情形是毫不奇怪的。

大約在二十多年以前，肯南最初開始外交生涯的時候，就被一小群國務院的重要官員選

爲俄國問題『主要外交專家』的『可造之材』。這些官員預見到，雖然他們作着種種破壞的活動，美國與蘇聯建立關係並在莫斯科設立大使館的一天即將到來。

因此他們決定必須選擇並訓練一些有才知的青年，仗着他們的協助使這些青年對蘇美外交建立並無限期維持一個完密的獨佔。

自然，担任選擇這些年青人的就是韓特生，他自己就打算担任這一派的首領，而肯南就充分符合了韓特生的期望。

從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三年期間，肯南除在德國讀俄文的兩年之外，他就駐在波羅的海國家，其時美國在莫斯科還沒有大使館，那正是對蘇聯作間諜活動的一些中心，肯南由於具有情報工作的天然癖好，配合這種制度是毫無困難的。

他一向偏愛一種可稱爲美國情報典型的歪曲虛假的報告，而不願蘇聯發展的事實。

二次世界大戰以前，肯南到蘇聯兩次，第一次是美國在莫斯科成立大使館的時候。肯南曾親自選擇一些當地僱用的人員，並主持原在里加進行而轉移到莫斯科的一部分『活動』。至於這種活動是什麼，也用不着根據什麼內幕情報去猜測的。

肯南二次在莫斯科任職時由於大使台維斯 (Joseph M. Davis) 的到來而弄得非常不愉快。大家都知道，台維斯注意的是蘇聯的事實而不是肯南與韓特生的謊話，他這做法與其時也在莫斯科的兩人的計劃是不合的。台維斯到蘇後不久，肯南就離開了。一向有人在說，只要有

人一提起台維斯那一天會再來莫斯科任大使的話，就會使肯南大爲頭痛，幾晚失眠。

慕尼黑事件之後，肯南被派去布拉格，據說他與哈奇的傀儡政府攪得很投機。肯南在這個職務之後被調往柏林，一直到美國參加反德作戰的盟國爲止。

大戰期間，肯南自然必須中斷他一生中最好的時期。這時候由於美蘇兩國已結成反德聯盟，正並肩作戰擊敗希特勒，肯南不禁認爲他的全部生涯落得一場空了。據肯南的密友們說，這時期肯南得了胃潰瘍，在美蘇盟誼較爲鞏固時，他的病也就愈壞。

我可以斷定說，一九四四年肯南接受美國駐蘇聯大使館顧問一職時，一定有很大的憂懼。不管他喜歡這工作與否，在這個職位上，他就得去適應兩國間的友善關係。

可是當他到莫斯科時，他發現他獲得的是個重要的職位，正可以用來審查這種邦交。羅斯福去世以後這種可能得到新的力量支持也就愈加明顯了。

肯南由大使哈立曼處得到了有力的支援，哈里曼早在羅斯福去世以前已經要背叛羅的政策。

我確實知道肯南會天天撰發電報與報告給國務院的主持者。

他旨在證明：

(一) 美蘇友善是種錯誤，美蘇兩國戰時雖有成功的盟誼，決不能和平相處。

(二) 蘇聯政府決心『統治世界』，『立即赤化歐洲』，並於最後『侵略美國』。

(三) 問題不論如何微小，美國必須『抵抗』蘇聯，由於『與俄國協議是做不到的』，因此在任何情況之下不與蘇聯政府獲致協議。

(四) 德黑蘭，雅爾達以及較後的波茨坦等協定（肯南雖然作狂妄的努力，沒有能阻止這些協定）都是嚴重的錯誤，美國在這些協定中所作的約言必須背棄。

肯南的電報與報告書得到國務院最大的注意，並極受贊揚，它們成爲新國務卿貝爾納斯聖經，國務院及世界各地重要使館決策人員等必讀的材料。

在一九四六年我啓程赴蘇以前，曾奉命在國務院的舊廈內參加八個到十個星期的講座。演講於每隔一天的早晨舉行。講師約二十至二十五人，主要是些會駐留國外相當時間的外交官。他們討論他們的經驗，並答覆我們的問題。這些演講的目的就在令國務院即將出國人員將來的工作發生反動的偏向，並教他們如何獲取秘密的情報，與『保持他們的耳目張得很開』。

肯南主講蘇聯外交政策與在蘇聯工作的條件。他所有的演說中都充滿了壞主意與反蘇的攻擊。在我們所有反動的講師中他也許是最反動的一個。

在華盛頓的代表金融與軍事集團的那些跋扈的反蘇分子正好發現肯南具有他們所要求的事物。在羅斯福去世後這些人已不通過合法的選舉而通過詭計去控制了政府。

肯南表示了他們的意見比他們自己還說得好，而且，肯南是從莫斯科這一帶有權威性的

地位發言，因而他的聲明擁有巨大的重量。

因此肯南他突然出乎意外地被捧為美國新外交政策的主要思想家。

一九四七年他被馬歇爾國務卿委任為『政策設計委員會』主席，他這首要思想家的地位被正式確定了。他在這個職位上的任務是為『可預見的將來』擬訂外交政策原則，並協助執行當前的政策，他經常有向國務卿進言的機會，對馬起有巨大的影響。

他有時甚至成為國務院見解的正式發言人，不久以前他以『X』先生的筆名在『外交季刊』上發表一篇文章。為了確保這篇文章的意義不受美國報界忽視，某些報紙的記者們曾被給以若干津貼。正合文章原來的意圖，它引起了一個激動，結果是這篇文章在美國與國外被傳誦的情形比文章用他自己的名字發表時尤為廣泛。

肯南在『外交季刊』上的文章很出名，這位國務院重要官員非正式發表的見解在莫斯科美國大使館引起公開而廣泛的注意。

肯南認為『美蘇之間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他不相信『美國能容忍』由蘇聯具體表現的『成功的社會主義繼續存在』。

他既認為戰爭不可避免，因而主張戰爭愈早到來愈好。肯南認為『強硬』政策或人們一向所稱『冷戰』正是引起全面戰爭的方法。他所倡導的『抑制』共產主義的政策也就是美國要佔領全世界的另一個說法。

肯南是一個頑固的親德派分子，他堅持主張一個重新武裝的德國，認為這是美國進攻蘇聯的矛頭。肯南一向倡導西方集團，他寧願令德國而不願令英國獲得這一系統的領導地位。必須說明的是，肯南的思想整個兒與有些希特勒的『哲學家』是驚人地相似的。

肯南像國務院內『蘇美事務獨佔者』群的同僚一樣，對原子彈具有巨大的信心，他認為它是對共產主義最後而唯一的答覆，而且夢想使用原子彈於蘇聯的城市，這點與肯南同僚們的計劃與希望也完全一致的。

除了蘇聯有遠見的政策外，實現肯南挑撥性的與擴張主義的計劃的主要障礙是美國。

肯南生平一向致力於外交，他在外交社會裏很顯著，可是他在美國生活的時間極少，對於一般美國人的生活與態度了解更差，因此他不滿於一般美國人的友善心情，猶同不滿於羅斯福及其內外政策一樣。

他甚至於不滿一個布爾喬亞民主的代議的政府制度，因為這制度雖有缺點，依舊相當逼迫着美國的外交官員公開報告他們的作爲。他不滿於有國會的存在，因為它干與着他自認具有的『高級的智識』的行動。他一想到選舉人的團體就面孔氣得發白，因為按最後的分析這些選民團只要拒絕採行，他的巧妙計劃會變成泡影。

肯南一定很知道普通一般美國人並不需要戰爭，因此在他可能被公開的論述中，他竭力說服他的聽衆，他的政策是導向和平的。但是他歷來建議的步驟是引致戰爭的。

肯南在美國馬戲團組織者巴嫩 (P. T. Barnum) 與林肯兩人所談過的原則中，他比較了解前者。巴嫩的原則說『瘟生每秒鐘都在產生』，而林肯說的是『你可以永遠騙着一些人，一時騙了所有的人，可是你不能永遠騙過所有的人』。

戰爭的歇斯的里亞像戰爭一樣，是一支飛機標槍，投射的人往往自己就捱到了它的射擊。肯南與他這一派已經在美國造成了一種戰爭歇斯的里亞，現在他們必須使它維持高漲，以避免他們所代表的政策以及他們自己的官運遭殃。肯南與他反蘇政策的追隨者此刻都處在最危險的境地，因為現在對世界和平與安全的威脅確比以前真實了。這也就是我為什麼要寫一下這位在相反或其他情況之下不值十五字的計開的人的緣故。

波倫——波倫在反蘇派外交官中間的地位並不比韓特生與肯南次要。在國務院內他被人們形容為『漂亮』，這句話的含意也許是說一種敏捷的腦筋加上非常的投機主義。

波倫早在三十年代就在巴黎讀俄文。他不經過在波羅的海國家的按例的訓練，曾被直接派去新成立的莫斯科美國大使館工作，他在大使館，在韓特生與肯南之下工作了幾年。

他一度調回國務院，但在一九三七年回到美國大使館，在莫斯科一直留到一九四〇年。這期間，韓特生在華府主持俄國部門事務，肯南被派在布拉格與德國，他是『蘇美事務獨佔者』在大使館內的代表。

可是波倫雖有這種責任，那時顯然並不被韓特生認為可担任與他合作的高級職位的人。

他的機會在後來。

在一九四三年韓特生被革去俄羅斯事務的職司而調到伊拉克之後，『獨佔集團』遭逢了一個嚴重的危機。集團內必須指出一個人來，不僅可信託以經辦這集團的事情，而且有鑒於白宮對於俄羅斯事務具有密切注意，他要能獲得羅斯福的信任。

波倫終於獲選，同時與波倫一起，另一年青的官員雷因哈特被調任了負責的職位。雖然如此，當雷因哈特被調任其他工作時，整個『獨佔集團』就交在波倫手中了。介紹波倫到白宮作爲美蘇外交的『新血輪』的準備是巧妙而謹慎的。當白宮上層與蘇方代表談話需要找一個翻譯時波倫被介紹的機會到了。

波倫被以『翻譯員』的身份介紹給羅斯福。他被稱爲國務院內適於充當這工作的『唯一人手』，雖然毫無疑問的華盛頓政府內擁有許多俄語說得比波倫好的人。

在外交界波倫被一般認爲具有吸引人的品格與大量『魅力』的人。所希望於他的是這種『魅力』加上他的『機智』能使羅斯福陷進爲他擺佈好的陷阱。

後來，羅斯福顯然相當喜歡波倫，他終於以爲波倫是可以委以大任的年青人。

一九四三年波倫被帶去出席莫斯科會議，以後被任爲東歐司司長。因此一九四三下半年，羅斯福又帶他去參加德黑蘭會議。一九四四年末波倫的地位已非常強大，已够格委爲與白宮聯絡的國務卿特別助理了。一九四五年初他曾參與雅爾達會議。

羅斯福去世後，波倫仍保持着國務卿特別助理的職位。他已成爲『蘇美事務獨佔集團』裏的主要人物，他名義上充任他出席的會議中的一個翻譯者，實際上已有權對蘇美外交提出影響深遠的建議了。

波倫以譯員與顧問的雙重資格參加了每一次高級的國際會議。波茨坦會議時他也在。從此以後這個狡猾的外交官參加了每一次外長會議，包括莫斯科的那次會議在內。他現在被全國務院認爲蘇美外交的『傑出專家』。

關於波倫值得記住的主要事項是他曾以小心翼翼的態度竭力破壞羅斯福的對蘇政策，波倫表現得好像是一個『開明分子』並努力於促進美蘇的諒解，實在是代表着『獨佔集團』，爲以後完全放棄羅斯福的對蘇政策打下了基礎。羅斯福去世後，他曾積極出力破壞大戰期間建立的兩國間的友誼。波倫的作爲是存心的，故意的，他完全清楚於自己的作爲。

不僅如此，波倫在任總統的蘇美關係私人顧問期間，會對國務院內關於這些事務的重要人員的委派，控制到一個很大的程度。杜布勞（Philippe Durov）的被提名爲他國務院東歐司的助手是由於他的力量，同時據我所知道，當他調任時，杜布勞能升任該司司長也是波倫設法的。以後杜布勞任美國駐蘇大使館的顧問，仍是波倫出的力。

一九四四年肯南獲任莫斯科大使館顧問一職是波倫的關係，而且很可能以後肯南被任爲政策設計委員會的首長，他也起有作用。換句話說。在羅斯福去世以前，波倫已經致力於按

排『獨佔集團』的成員於主要的位置上。他這麼做，是爲回復對蘇仇視的老政策作了準備。波倫曾致美國報紙形容爲德國著名軍火製造商克虜伯。波倫家族的後裔。這種說法很可能是假的，但是它也有它一點真實。如果波倫確是克虜伯。波倫家族在美國的一個代表，那末他就不能更成功地代表他們的利益與所有大資本家與帝國主義者的利益了。

看他的記錄是很清楚的，他不僅充任『蘇美事務獨佔集團』與它狹小的權益的『親信人員』，而且也是華爾街與美國金融權勢的『親信人員』，這些人會一再說他們決不能容忍由羅斯福所計擬的蘇美友誼與聯盟。

杜布勞——杜布勞這人我打算在本書別處詳細寫他，他與『獨佔集團』開始接觸是在一九三四年他被派在美國駐蘇大使館工作的時候。

他從此成爲這一派的主要而最受信任的代表，曾擔任過一系列責任重大的職位。在任時會有效地代表他們的權益。

賽佑 (Charles Thayer)——賽佑是波倫的姻兄弟，西點陸軍大學的畢業生。現在他在紐約主持『美國之音』廣播。他的被選充這個職位是因爲一九四〇至一九四一年間他任職駐蘇大使館具有在蘇聯工作的經驗。

賽佑在『美國之音』工作中代表『獨佔集團』：可是對這個集團而言他是個『有希望的人』，很可能在以後短短的時期內聲名大噪的。他很可能在國務院與國外蘇美外交上擔任十

分重要的職位，從而竭力推行他朋友與親戚們的反蘇政策。

斐琪——斐琪在美國駐蘇大使館與國務院當蘇美外交專家爲時很長。他是最初與波倫，肯南一起訓練來作爲『獨佔集團』內韓特生的助手的，『獨佔集團』會帮他獲得一些重要的職位。

雷因哈特——關於他我將在以後詳細地寫一寫。他是這群可憎的人物中最可憎的一個。看他至少該像看這一派人中其他的人一樣加以輕視的眼光。這個無廉恥的人在國務院，特別在美蘇外交方面，自有其出衆的經歷。以後他很可能在這方面工作上活躍一個相當時期。

史第文斯 (Francis Stevens) ——史第文斯是又一個這一派的人，最近六年來曾在蘇美外交方面歷任負責的職位。據他正式的傳記，他也由國務院予以俄文的訓練。

R. 合維斯 (Michael Davis) ——R. 合維斯在我到莫斯科前在大使館工作，一向在國務院內担任蘇美外交方面負責的職位。他不是這一派的充分成長的成員，但是他正賣力地爭取當一個成員。

担任R. 合維斯這樣職位的人，只要他同意惡毒的反蘇政策，一定會被吸收到這一派去，不然，他不贊成的話，就會根據某些很方便的藉口被拋棄在一邊。

湯普生 (Llewellyn Thompson) ——根據我在大使館聽到的說法來判斷，湯普生還不能稱爲『獨佔集團』的一個成員，可是他會與它合作，而且現在在國務院內正佔有着一個

重要職位。

J·台維斯 (John Davis) —— J·台維斯是一個遠東問題專家，雖然他在莫斯科住過兩年（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可是他不是蘇聯問題專家。

不過，J·台維斯確是一個『蘇美外交獨佔集團』如何拉攏經辦其他地區事務的人員以擴展該派活動的一個特出的模範。

我在美國大使館直接和J·台維斯之下工作，因而了解他很清楚。像他們這群人中間有些人一樣，他對他自己個人的生涯把得很牢，不管他得如何卑躬屈膝；他將竭盡一切可能發展他的生涯。

J·台維斯是在中國長大與就學的。他是關於東方的陰謀的主宰，想法也像中國的政客們一樣，由於現行美國外交與中國反動的政治有許多相同的地方，因此他的這點特點，大大地有了用場。

而且，J·台維斯受他妻子的影響很大，她像他一般機靈，而且對於他的生涯也一般有興趣。他的妻子是美國資本家與政客格萊迪 (Henry Grady) 的女兒，格這幾年來被選充特別可憎的種種外交差使，這種工作需用奸詐與種種做壞事的習性。

在大使館內，J·台維斯是肯南與杜布勞政策的主要執行者之一，他控制着美國新聞處的活動與『新聞報告』。

J·台維斯受命於肯南與杜布勞從所有大使館僱員中搜集他們與蘇人來往與相互之關的
情報，他的妻子就是一個熱心的幫手。

J·台維斯具有小丑的性格，時常被派在大使館內部的事務中担任挑撥性的任務。他曾
奉命顯露某些僱員與官員的職位，使他們被調離莫斯科。J·台維斯曾被派趕走魏里斯（
Arm nd Willis），順利達到目的。由於我是一個見證人，我打算在以後詳細記述一下。

J·台維斯又奉使館之命與駐莫斯科各美國報刊通訊員，密取聯絡，如獲取情報與達到
可能的挑撥性的目的。

我走進J·台維斯的辦公室而不看到一兩個記者和他在一起的時間極少。他會有計劃地
利用某些記者，藉以發出一些關於蘇聯的歪曲的報告與挑撥性的謠言。他有計劃地使這些記
者使用他自己的以及大使館其他官員的全部秘密報告與電訊。他鼓勵這些記者採用這些報告
書的材料，在他們回美國後寫進文章裏去。自然，這做法是旨在直接影響那些給美國民衆的
關於蘇聯的消息的格調的。

可是這類事情最罪惡昭彰的例子發生在一九四七年莫斯科外長會議的時候。其時J·台
維斯會命令他的屬員一個一個向替他在大使館搜集關於其他美國同事的情報的女書記，去彙集
一批關於蘇聯的虛偽報告，供給那些來到莫斯科的幾十位通訊員，這些人名義上是來採訪外
長會議消息的，實際上大部分都奉報館之命搜集謠言與虛構消息，以便帶回本國當作「記者

實地採訪所得俄國真相」向美國報紙讀者發表。

會議期間，台維斯鼓勵所有記者參閱所有這些報告並摘錄材料，甚至抄錄全部報告書，以後當作『獨到觀察』而發表。這期間他幾乎全部時間與記者們在一起，他供給他們以他特製的關於蘇聯及其生活的巧妙謊言。大部分記者被派去諦聽與報告的就是台維斯供給他們的。那一套。他們都因為自己無須去設法憑空虛構而大感滿意。

我相信，J·台維斯決不是一個職業的間諜，如果是的話，那一定不是一個非常有經驗的。舉例說，台維斯會派他大使館顧問處內一個官員，有計劃地訪問我所有要求入美國籍的『有趣人物』。

這個官員，名叫瓦雷斯，以後被大使館逐出莫斯科，因為他發生過一次酒後的口角，幾乎把頭蓋骨都打破了，那時他是要爲J·台維斯撰寫他『訪問』的報告。J·台維斯往往將這些談話的報告再加上許多反蘇的謊言，告訴所有他的朋友，然後由他們傳遍全大使館。

J·台維斯會親自詢問一些到領事科來的人，設法覓取適合於他反蘇路線的『消息』。J·台維斯在莫斯科大使館內的工作十分稱職，因此他被赦免了他以前的罪行。這些所謂罪行包括他在中國採行了一種對中國共產黨有好感的方針。自然，台維斯實在不是什麼『有好感』，只是通常的兩面姿態而已。他的希望是代表國民黨政府與美國獲取一些關於中國政治的高等的情報與挑撥性材料，可是他出了錯，甚至於在美國人之間也獲得了一個在中國

政治上親共的名聲，於是在那次駐華美國大使館實行大整肅時被調離了中國。

他被派到一個在莫斯科作爲自行表白的機會。他的確明白了自己，他在莫斯科工作的如此惡辣，以至引起了『蘇美外交獨佔集團』的特別注意。

他離莫斯科後，回到華盛頓，發現他被派在以肯南爲首的政策委員會內工作，他有了這一個有利的地位，從此就在一個更大的範圍內行使他的機謀了。

國務院的『蘇美外交獨佔集團』在人員與影響上都有迅速的發展。自然，他的最終目標是接管所有國務院政策的指導。

爲了供給一大批『反蘇專家』，一大批年青外交官的訓練業已有所安排。這些年青官員在『獨佔集團』領袖們指揮之下工作，將旨在佔盡全國務院與美國駐蘇大使館的重要職位。計劃中的是在目前這些領袖們退休之後，由他們最後來接辦『獨佔』。在這些助手中有某些人頭地的，已顯然預定在將來擔任主要職位的了。

『獨佔集團』就是這樣計劃它的反蘇活動的。

第三章 莫斯科之行

我對於我有機會到莫斯科在大使館工作感到很快活。在我童年時期，我聽到關於俄羅斯的事情不少，它在我看來像是一處神秘，遼遠而迷人的地方。以後我入迷於屠格涅夫，托爾斯泰與普希金的作品，雖然它們在譯文中已喪失了若干原有的神韻。可是，它們使我相當熟識了我一向很少知道的俄羅斯人民的生活。

我曾在美國學校受教育，讀美國的報章雜誌，曾被動地吸收了這種『自由』出版物所刊關於蘇聯的一些愚蠢的無稽之談，同時我感覺到美國出版物在它寫蘇聯生活的作品中採取着遠背於客觀的立場。

爲世界產生羅摩諾索夫，托爾斯泰與普希金這一類天才的國家——蘇聯會像赫斯特報紙以及我的國家其他報紙雜誌所歸罪地作那樣壞的主義與行動，是很難令我相信的。

關於蘇聯政府在公衆教育、公共衛生、社會安全、母性與兒童保健之類活動的一些新聞，雖然有些歪曲也已引起了我的注意。這些片斷的消息靠着純屬理論的關係，才穿過了『鐵

幕』。按『鐵幕』是美國統治階級所創造，旨在防止一般美國人真正知道了蘇聯的實況。

在適當的時候，我開始理會到這些經常竭力在美國散佈的對蘇聯的譏言攻擊是很可能用同一些合於邏輯的事實解釋明白的，這就是那掌握着所有政治與經濟權力的美國六十家怕透了蘇聯的榜樣會起『傳染』。如果一般美國人發現了在一個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社會平民比在資本主義之下生活得好而享受到較大程度的自由，也許他們將有意將美國所有生產手段與政治權力掌握到他們手裏。在我看來，美國的統治階級在美國人心中竭力詆毀蘇聯的生活方式確實就爲了那個原因。

我雖然本能地感到真相如此，可是，實在的，我的這個思想還只在它的胚胎時期，在美國多年的學校教育不是沒有它們的痕跡的。因此要我指出在蘇聯『消息』名目之下，美國學校內對學生教授的所有無稽說法也相當困難。我懷疑這麼做是否有它的必要。

在美國學校內讀書的普通人們除非有特別辦法能夠找到關於蘇聯的真相，否則都獲有蘇聯是個野蠻落後的侵略國家的印象。美國的統治階級都領略到那古老的廣告口號，即『名聲即重複』(Reputation is repetition)，一個公司或它的出品可以使着在報上、廣播中以至於天空字跡等方法重複宣傳而造成良好的名聲。因此甚至毫無根據的臆斷也用這種方式灌輸給了美國民衆。

舉例說，在美國所有街角與大路上樹有無數吹噓可口可樂的奇妙性質的廣告牌——『令

人心曠神怡，雖然美國醫藥協會雜誌會時常發表統計說可口可樂會損壞牙齒的毒藥質，成百萬人都盲目地相信可口可樂有益健康，因為一種雜誌的銷數不過幾千份，它敵不過在招牌、報紙與廣播中無數贊揚可口可樂的虛偽性質的廣告。

美國統治者進行反蘇宣傳也根據同一廣告原理。他們相信一再重複宣傳各種關於蘇聯的誹謗性的謠言，到足夠的時候，一般美國人最後也就會信以為真的。他們知道進步報紙上發表關於蘇聯的真的事實，並不能達到大多數的美國讀者。這是因為它們的銷路少，而且缺乏出版報導各國真相的較大的進步報紙的錢。

美國報紙有自由的意義只是指它可以對美國進步團體，職工會，蘇聯及各人民民主國家發表無可計數的誹謗性的指責。

我的所以同意赴蘇工作，當時就由於我抱有了解蘇聯及其人民的真相的宿願。

當反對法西斯野獸的戰爭進行時，我會屏聲息氣地注意着蘇德前線的發展，紅軍士兵保衛他們家鄉的傳奇性事蹟，莫斯科、史達林格勒與列寧格勒的激烈戰事，德國侵略者在蘇聯的潰敗，所有這些都使我確信一個以史無前例的態度保衛其榮譽與獨立的人民決不會像美國學校、報紙與雜誌教我們所想的那樣惡劣，只有愛國甚於愛自己的生命的人民才能這樣保衛國家的。

當我猶在美國時已經清楚了這一點。我要親眼看到蘇聯以及按我當時的想法那制服法西

斯野獸的英勇人民，我毫無疑義地感到托爾斯泰與普希金的人道主義與今天蘇聯的人道主義之間有它的連貫性。

我決心忘記所有美國報章雜誌與學校裏所告訴我的關於蘇聯的種種，以便有機會獲得關於蘇聯的第一手的材料，能了解蘇聯人民並得出正確的結論。

美國人愛談俄國是個大謎，這國家對我也的確有幾分神秘。我要解決這種神秘感，就要了解那將俄羅斯從一個落後國家變為一個世界強國，而它又戰勝最具侵略性而軍力充足的帝國主義國家的原動力。

因此我到了莫斯科。

我在莫斯科美國大使館內的工作是我在外交界初次的工作。這也是我第一次在國外工作，以前我從沒有在使館或領館內工作過。

當我在美國空軍與戰略服務局內工作時，過手的文件證明美國國外的使領館都參加情報活動到一個相當程度。我們時常收到駐各國的美國使館的報告書，上面標着『最機密』裏面包含着這些國家政治經濟情況與軍力的情報。這些都是由使館的官員們寫的。

我在情報機關內工作時，會天真地想情報工作只是大使館工作的一小部分，大使館的主要工作是在改善美國與使館駐在國家的關係的，我又認為我們的使館是在經辦正式獲得關於駐在國情報的客觀消息的傳遞。一般說，我認為美國大使館的職員是美國人民在國外的『耳

員，由於美國與美國人民的利益，要求許多國家政策的真實而客觀的情報，他們在工作中應該客觀。

我又認為國外各美國大使與大使館職員應用他們的才能與努力，維持與駐在國政府間的正常政治與貿易關係。如果沒有這種客觀的接觸，也就不可解除這種妨碍建立一個安定與繁榮的世界的種種紛亂、相互誤會與矛盾了。

實在的，如果在某一國家的一個美國大使館在它給政府的報告中始終歪曲關於該國政策的事實，說這國家有不利於美國的侵略企圖，而實際並不如此，那末這種捏造的不客觀的消息勢必令美國人民的利益遭受不可補償的損失。就由於這個理由，我認為對它們駐在國抱客觀的態度，對正式獲得表明該國的真正政策的事實作非出於感情的紀錄，該是美國大使們及其職員們的主要事項。

我必須承認當我在大使館工作時在這方面感到痛苦的失望。在我進大使館最初幾天我就明瞭了，不僅大使、顧問與秘書之類相當能決定國務院的對蘇政策的人，就是大使館各部門各級僱員在觀念上也多是極端反蘇的。在有些情形下，他們對蘇維埃制度的仇愾是出於病理上的。

我已經明白大使館是國務院縮形的真本。大使的來去就像國務卿，但是大使館的一些重要職位例如顧問與秘書，多年以來就控制在國務院上層反蘇派如肯南、杜布勞、波倫、雷因

哈特等人手裏：在決定形成國務院反蘇外交政策的方針與方法上這些職業外交家起着主要的作用。

現任美國駐蘇大使史密斯 (W. B. Smith) 是個職業的情報官。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曾直接與美國軍事情報機關聯系。在二次大戰時，他任艾森豪威爾將軍參謀長期間，曾指揮歐洲美國遠征軍的軍事情報活動，值得注意的一點是甚至美國新聞處爲供在蘇聯發行而出版的『美利堅』 (America) 雜誌 (在我脫離大使館以前我的職務之一就是充任這刊物的助理編輯) 就在它第一期中登過史密斯一張照片，下面的說明是他被認爲『一個情報工作有經驗而傑出的組織者』。國務院要派一位有經驗的情報活動者當駐蘇大使，顯然是要給予這些職業外交官在反蘇情報工作上的一種必要的指示與有資格的領導。

我明白了我在大使館工作實是在我在來莫斯科以前工作過的同一情報系統中我的工作的繼續。唯一的不同是：我在國內工作是在收的一邊，就是說對國外獲得的情報加以研究與傳播的組織，至於我在莫斯科，用句軍事術語，那是前線，是搜集情報的組織。

事實上所有大使館傳遞給國務院的情報都是加有極端的偏見的。蘇聯的內外政策，以至於蘇聯發生的事件與事實都被始終滲透以大使館上層領導者極端的反蘇態度，這些領導者包括大使史密斯，顧問杜布勞，一等秘書台維斯與雷因哈特等在內。然後國務院在向美國人民轉述以前又把這些假情報加以誇張。

我與大使館內各級職員的談話，以及我個人的觀察都很快爲我證明，凡大使館內的職員在工作中，或者甚至僅僅心裏有意，對蘇聯保持客觀態度都一定很快知道他們必須改變他們的態度，否則就……。他們終於明白，他們如果不改變他們的態度，將被召回與免去公職，這遭遇在美國是同死刑判決，因爲一個因『對美國不忠』而被政界整肅出來的人沒有一個美國公司會給予工作的。

由於聯邦調查局挑撥性的活動的直接結果而被政府開革的許多美國僱員就有這種經驗。這些人被政府革職並無任何確定的罪狀，以後在私人公司方面就難於找到工作。

當我說明有些對蘇聯保持客觀態度的個人，我並不是指那些職業外交官，他們往往是完全選擇過的，按例只有那些最反動的分才被派出國工作。我所指的主要是那些參加國務院工作事情相當出於偶然的一些人，這情形是大戰時期國務院外交工作擴展的結果。這些人係來自美國的一些大學與科學機關。不過國務院也會在這些可能的候選人人員中竭力挑選最反動的分。

杜布勞是美國駐蘇大使的顧問，擔任這職務已經兩年，他這職位是大使館內最重要的職位，他代表着國務院內的反動派。

杜布勞有個特點，這是遇見過他的人都會很快發現的。他有一種蓋過其他一切的超特心術，關於這個他是不能沉默的。杜布勞以一種巨大而惡性的怨恨與憤怒對俄國，對蘇聯以至

所有斯拉夫的一切，有時會使得他不能自制。

他這種心情從那裏來的，背景如何，心理上的根源是什麼，我無法解釋。甚至於史密斯大使也完全受他的擺佈，史密斯對蘇聯的態度是從不容觀的。

可是說下一點事實就夠了，美國駐蘇大使館的職員都已經尖刻到了極點，還每天被灌輸着反蘇的謔言與譏諷，在許多場合他們自己就是激烈反蘇反俄的，可是對於杜布勞那種觀念的『強烈』也感到不習慣而吃驚不已的。

他們相當習慣於美國外交官尋常職業性的反蘇主義，他們爲了發展他們的官運而採納了大部分，他們都已感受肯南所小心措辭的所謂『思想』，但是杜布勞是他們所不敢請教的。這個肥矮而頭腦有條理的人正是兩面做法與陰謀的主宰。他和人來往時，笑口常開，能開玩笑，還親熱地拍人肩膀，最初會使人感到是够誠實而謙遜的傢伙，甚至有許多因杜布勞的陰謀而被解職的人們也還堅決相信杜布勞是他的好朋友。

可是這不是說所有到莫斯科的美國人都受過這個表面上相當坦白的人的騙。不少人看穿了他。事實上即使是在那些大使館內探行杜布勞政策的人們中也有許多人厭惡而輕視他，在隨便一群在莫斯科的美國人中一提到他的名字時，很少不接着聽到一種暗笑或甚至一場發狠的大笑的。因爲有許多美國人就要譏笑他，他的特性之一是自炫。在一次宴會上，他一定要設法成爲大家注意的中心，有時因此就在房間的中間脫起衣服來。他的古怪做作要超過任何人。

一九四七年秋，在大使館舉行的一次化妝聯歡會上，杜布勞化妝爲馬戲班的巨人與舉重者，穿着貼身的緊身衣，混身用口紅寫上一些字句，整晚上他獨佔了場面，不給別人一個表演的機會。

在這個場合如果有人爲他發出笑聲的話，那一部分是由於他以大使館顧問地位扮演一個小丑，不笑不禮貌，一部分是由於他可笑而的確滑稽，如果這角色他演來唯妙唯肖，他實在該受僱於馬戲團，而不該受僱於國務院，依我想，小丑是不配在國務院的。

可是這個小丑在國務院內部各會議中的確已經爬得相當高了。

杜布勞要不是偶然地進了國務院外交機關，他也許今天就在美國某處從事於齷齪的政治活動或曖昧的律師業務。他可能收入極豐而名譽極壞。在他看來前者是比後者重要的。

可是，他就使用他的天才於國務院，進行一些大大小小的詭詐。杜布勞的才能是被頗受重視的，對國務院反蘇派而言，杜布勞的詭計就同肯南的『思想』一般重要；反蘇派採用各種方式來毒害四周的勢力，杜布勞就是長於此道的專家之一。

杜布勞是國務院反蘇派的一個下級配角：多年以來，他一直沒有被這一派完全而熱心接納，這一派人對於任何一個設法鑽入內部的新來者都是嫉忌的。

他以在華沙與布加勒斯特的職務開始外交生涯，一直到一九三四年才被調到蘇聯，他在莫斯科供職了三年半，與韃特生及肯南建立了堅固的聯系。

可是杜布勞還沒有令韓特生感到應予以對蘇外交上進一步的任務。一直到大戰爆發，他才被召回，顯然這也是由於這一特別活動普遍缺乏有訓練的人員而作的一個試驗。

可是他相當滿足了這個試驗，因此到一九四四年他很快接連地被任爲國務院東歐司副司長，然後又升充司長。

一九四六年他被任爲駐蘇大使館的顧問。

在大使館工作的人都知道在最近以前經辦大使館的不是大使，而是杜布勞。實在決定人事問題與決定拍往國務院的最重要電報的也是杜布勞。

國務院常任的僱員們也知道杜布勞終身供職於國務院，因而自然會有一個長時期會掌握權位的，同時他們也都知道大使是遲早會離開國務院的。因此他們自然對杜布勞比對大使更爲注意。

杜布勞到莫斯科之後，會竭力建立與維持蘇人與大使館美國人之間的『鐵幕』。他這麼做，首先是因爲他對蘇聯人的影響以及他們對他的部下可能起的作用具有卑劣的怕懼。

其次，他愈能令他的同胞與四周的社會隔離，他也就愈能在他們之間獲得對他那套反蘇企圖的輕信。只有在與他四圍的蘇人完全隔離的狀態之下杜布勞才能進行他的『仇蘇』計劃，而不致於在大使館內部引起衝突。

有一點必須說明的，雖然國務院會根據對國務院無可置疑的忠誠的原則對派往莫斯科的

人員作過非常謹慎的選擇，雖然這些人員每天在大使館與國務院領受宣傳與教訓，還是有些心地良好而誠實的人，漏過了『忠誠測驗』。這些人如果熟識了蘇聯人以及與他們的態度與目的，他們就永遠不會接受布勞的謬論，也不會協助他的『仇蘇』路線。

因此杜布勞得大使與國務院充分的支持，使用直接間接的壓力，設法防止他的職員與蘇聯人長期接觸的發展。

在有些情形下，維持這種長時間接觸的人會在被大使館官員們知道後，召去問話，被囑令斷絕關係否則將受不名譽處分，送回本國。在另一些情形下，這種人就被調到另一崗位上去，或藉虛偽的口實調回美國。

杜布勞有生以來凡他能偷偷摸摸做的事情，從不光明正大地去做的，某些職員如果有背於他的命令，他往往等他們休假或爲其他理由而離開蘇聯時，才設法把他們調職，防止他們回來。

我確信我的同房間同事華斯去柏林療養後不能回到莫斯科就決不是一次偶合的事情。

自然，杜布勞防止美國人與蘇人作長時間接觸的做法對那些從事搜集情報的許多美國人有顯然的例外。這些特務有的是大使館的陸海軍人員，也有不少是就地僱用的平民，他們不僅准予發展這種接觸，而且是奉命這麼做，須把這些接觸向大使館作充分的報告。

杜布勞控制大使館人員的主要辦法是一種囚人制度 (System of stool pigeon) 這些囚

人經常向他報告其他美國人的活動，他們的政治觀點，他們的私生活；他們的朋友交誼，而且他們特別注意於有一點背離大使館與國務院政策傾向的人。我聽說，大使也是這種『報告者』制度的大信徒。

對這種制度特別有用的是那些使館官長與僱員們妻子，一個顯著的例是J. 查維斯夫人，她有意鼓勵大使館女職員要對她『坦白』，然後她有系統地報告她丈夫與杜布勞她們的反應，以及她們從大使館其他人那裏聽來的一些閒話。

這裏需補充一點，據大使館的輿論，馬吉陀夫 (Robert Masidoff) 在這方面也有用處。他以『獨立的』局外人身份發表一些同情蘇聯的話。從而他探明並報告了有些信任他的『異議者』的態度。

杜布勞在莫斯科期間排斥了所有使館內他認為不順眼的人員。有時他使用到國人的報告。對他所不喜歡的人的『忠誠』加以懷疑。另些時候他使用一些比較生硬的辦法。

以前大使館有個安全警備，他對工作太賣力了。在工作時間之後，他照例到各處辦公室巡視一周。他兩次發現杜布勞的辦公室沒有人看守時保險箱開着，因而兩次說起他要把這種違犯安全的嚴重事件報告國務院。此後不久這位安全警備休假離蘇，當他仍在蘇聯境外時，出其不意地被調到了另外一個職位去了。

杜布勞像國務院『蘇聯事務獨立集團』的其他人一樣，對於歪曲他關於蘇聯的報告十分

實力，實在杜布勞報告的盡是合於他的政策的消息，那就是誹謗蘇聯的消息。雖然根據我的消息與印象：杜布勞在這方面的工作非常粗率，可是由於收到並閱讀他的電訊與報告的華府人們都存心相信他告訴他們的任何謊話的，因此他有他一輩現成的讀者。他愛他這種『工作』，無論什麼時候他一聽到什麼可以歪曲到反蘇方面的閒話，或某些事實，他一定會像小孩子得到了新玩具一樣高興。

這位俄國事務『專家』，除了告訴廚子他晚飯要吃什麼以外不懂俄語，而且也幾乎完全不明白蘇聯，可是他的這種『報告』在華府有它現成的聽衆，這一方面是由於他那些聽衆的容易被騙，另一方面是由於一種由反蘇情緒產生的主觀願望已制服了客觀觀念。

據我所確實獲得的經驗，每逢美國有一位新的職員到大使館來，杜布勞一定以巨大的熱力開始訓練他的反蘇精神，而且以後仍按該員顯示的反蘇思想的程度而或多或少地繼續他的訓練工作。

根據我與大使館內有些思想進步的職員的談話，我得到了如下的印象：他們中間有些人，也許由於天真，認爲如果大使館換了一個顧問——顧問實際上主管着大使館政治工作——整個空氣也就不不同了。

根據我在國務院所聽到與看到的關於前任大使館顧問肯南的情形，確信杜布勞正是他的一個好的承繼人。

杜布勞鼓勵美蘇之間的惡感，方法與方式完全與肯南的相同。

根據我與其他一些人的經驗，我已明瞭所有由大使館發往國務院的主要文件都是由杜布勞親自編撰的。大使館的職員們對於他的政治與文字格調都很熟悉，因此知道如果他們的報告不包含兩三個對蘇聯的攻擊，如果它們在形式與內容不是完全用來反蘇的，杜布勞決不容許這些報告送達國務院。

大使館的職員們切於保持他們的職位，獲得杜布勞的好感，從而獲得國務院掌權派的好感，他們寫的報告也都是這種特別的格調。雖然如此，杜布勞仍根據他自己的創見，對幾乎每一個關乎蘇聯生活的文件都加上了反蘇的解釋。

由大使館職員、軍事代表、記者以及其他人員彙集的反蘇情報都是用同一方式處理的，而且一定要在杜布勞核准之後才送交大使簽字發到華盛頓。

杜布勞像大部分他的同僚一樣，對美國的制度毫不尊重，時常對國會以及美國總統傳言誹謗，甚至當着自己的職員們也是如此。

他像他國務院蘇聯事務獨佔派的大部分同僚一樣，他寧願美國目前的政府代之以一個專制的反共政權，使他這群人因此能不受任何干涉，進行華爾街授意的政策。

可是，一般說，杜布勞並無獨立的政治觀念，他有的只是感情的反映。他仇恨蘇聯，因而所有他的作爲就都受着這個首要的事實所決定。

雷因哈特是美國駐蘇大使館一等秘書。他身高膚黑，漂亮而圓滑，正是大部分美國人想象中的外交官。他所缺乏的只是傳統的單片眼鏡。

他最擅長於參與『外交的』茶會，外交的歡迎會，以及別人出錢的鷄尾酒會。他始終明白爲了發展他的官運，他該和誰友善，而且他始終懂得怎樣達到這個目的。

雷因哈特是一個女人的人，老於應付女人。他對於討好有權勢的老年女人與勾引妙齡少女同樣頭頭是道。

他的資本是他的性感，他已經發現外交上成功的關鍵，至少是關鍵之一，就是討好對他官運有關的人們的妻子。

雷因哈特是『非國家化的』美國人的一個傑出的例。他大部分的教育，甚至於初級教育，都是在西歐受的，他能操流利法、德、西、俄四國語言，他對於美國幾乎一無所知，也許對美國也毫不關心。他在美國居住的時間並不長，每年照例在瑞士消度假日。

如果說雷因哈特對於『粗俗的』美國人毫不關心，那末他對於『文明的』德國人是關切備至的。他像肯南一樣是個親德派。一九四〇至一九四一年間美國參戰以前，他在莫斯科，其時雖然大戰已迫在眉睫，美國政府對希特勒已時常宣示敵對之意，但是雷因哈特最好的朋友還是莫斯科德國大使館的人員。他是他們的酒友，如果這事情早爲外人知道的話，他正是德國與蘇聯情報工作者偵取美國對德蘇政策情報的寶貴來源。

像肯南一樣，雷因哈特被視為國務院內不僅是蘇聯問題而且是德國問題的主要專家之一，這點事實的意義，我們就可以根據上述雷因哈特這些天然的對德同情來加以判斷。

可是雷因哈特的特性的主要原動力既不是對德國也不是對畏俄病者的同情，不論這兩點對他是何等重要。

雷因哈特所最關心的是他的官運。他是單純的官迷，不管代價如何不管他得如何去卑躬屈膝，他永遠求昇遷。

美國駐蘇大使館的人都知道，雷因哈特大戰前在莫斯科時，曾與一位有荷蘭血統的美國女郎發生熱戀。大家也都知道這一場熱戀的結果是一個孩子，他生下不久就夭折了。

可是雷因哈特並不與這女郎結婚，雖然他曾無疑地愛她，可是由於他認為她既無財富，又沒有社會地位，結婚會『毀壞』他的官運。究竟他與一個美國女郎結婚，甚至是一個無財又無勢的女郎結婚會怎樣妨礙他的發展還不明白。可是他就這麼想，這事情正可以藉以了解他關於他自己官運的一般識見了。

雷因哈特於一九三七年在國務院外交部門開始他的政治生涯。一九三九他被派往塔林美國公使館，已接近了美蘇外交的邊緣。一九四〇年他被調到駐蘇大使館，擔任三等秘書，一直到一九四二年。這一年他被調回國務院，在處理蘇聯事務的一司內在韓特生之下工作。

可以說，就是他這次與韓特生的接觸使他立即被吸收到國務院『蘇美事務獨佔集團』的

反蘇派官員辭職。

韓特生曾遭逢一次極頂困難的境遇，我在上面已寫到過，在一九四二年，韓特生曾成爲國務院的一個笑柄，而且更重要的是白官也知道了在這個緊急關頭，韓特生企圖破壞美蘇關係，因此羅斯福準備把韓特生調離蘇美事務的工作。

韓特生感覺到了這一點，急於至少要加強國務院他自己那一單位內『俄國問題專家』的地位，如此則即使他暫時被『流放』，也還可以像以前一般活動，雷因哈特正好適應了這個要求，他其時正在華盛頓東歐司，他還沒有連累得和其他一些蘇聯事務『專家』一樣。他可以被用來儘可能推行反蘇政策。

此後他被放進了反蘇派而且從此成了蘇美事務的領導者之一，其地位僅次於肯南、波倫或杜布勞，可是他還是這方面會成了重要角色的一個人。

如果要認爲這一小群蘇聯事務專家們是合作無間的，那是一個錯誤。雷因哈特怨恨杜布勞是衆所週知的，他在使館內與一些他最熟的朋友作私人談話時就毫無顧忌地流露着這種心情。

杜布勞對雷因哈特也抱着同樣的心情，這是意料中的事情。可是當着面，他們是最親熱的朋友，他們在美國對蘇政策上是有基本而完全的協議的。

雷因哈特之恨蘇聯也和杜布勞差不多，他一定很想用原子彈把蘇聯從地球上掃蕩出去，

在大使館內部他最毫不猶豫地這樣表示的，他對蘇聯的一切存有深惡痛絕的恐懼。

在最近以前雷因哈特一直主持着譯報部的工作，它每天向華府報告蘇聯報紙所發表的消息。

雷因哈特任這個職司時，曾派一個據說他的親戚的外交官亨利 (Henry) 紐任譯報部的主任，雷因哈特處理這工作集中了大量的精神於可以在解釋上有所歪曲的發展上，目的在把蘇聯政策與政治生活歪曲到最大的程度。他的報告經常致力於支持國務院與大使館的反蘇政策，並致力於隱匿各種不合於這些政策的事實，不令華府的國務院知道。自然他在大使館佔的地位是相當重要的。

雷因哈特以後被派與別國外交官聯絡藉此搜集可以用來誹謗蘇聯的情報。他是莫斯科間諜與謠言最熱心的搜集者，並把閒話與謠言中合於他報告計劃的東西很快地報告國務院。在他孜孜不倦地發展的這種外交工作方面他的能力是很受重視的。

大使館的人認為雷因哈特很可能負起蘇聯公民中間進行情報工作的任務。一般認為他與美國的一些軍官與民間情報機關關係極密，因此他受這些機關託以各種任務，因為這些機關需要着一個具有較高的外交官職而通曉俄文的人工作。說一點就夠了，雷因哈特雖然竭力在大使館人員面前隱瞞這一點，他竟敢與某些蘇聯公民來往的心情是幾切的。

他在大使館領事館這部分也有密切聯系，這部分的情報特務專致力於從請求入籍的人們

口中探取情報。

雷因哈特最近任駐列寧格勒的美國領事，在大使館內部看來這職務在情報工作中是有頭等重要性的。可是雷因哈特因爲懶於作安排並沒有去列寧格勒。雖然大使館會向國務院僞稱蘇聯對領館在列城成立有所『留難』，但大使館內部都很明白這一點的真相的。

事情很清楚的，雖然永久性的建築需要一個月左右的時間，工作在列城臨時的地方進行也還是可能的。可是，這與雷因哈特的興趣不合，因此他對這事情什麼也不幹。

雷因哈特被派在大使的私人住宅斯巴索大廈居住，協助大使經營這大廈，辦招待事宜與若干其他『工作』。雷因哈特怨恨這種安排，而且對大使也毫無好感，這事情與最近幾次宴會上發生爭吵之後，已成了大使館內大家的話題了。

雷因哈特是值得這麼詳細地描寫的，因爲他是國務院反蘇派的一個中堅的年青分子。他年方三十餘，他今後奉派在莫斯科，華府以至世界其餘部分倡導反蘇政策還有一段很長的官運哩。

放遠眼光來看，他在國務院內幾乎一定會佔有若干重要職位的。他那種力圖發展的非常能力幾可保證他將來的地位的。

雷因哈特走着韓特生，肯南與杜布勞的道路，而同時正忙於訓練小韓特生、小肯南、小杜布勞、小雷因哈特來進行以後的美蘇外交，像他這樣的人的穩固地位是下一事實最清楚的

表示，即國務院已把命運放進了一些竭力要繼續削弱美蘇關係的人們手裏了。

要不是美國內部發生基本的政治變化，從而同時肅清一下國務院，美蘇關係的改善是沒有希望的。

像雷因哈特一類人都知道，一旦美蘇重趨友好，他們的官運也就慘淡地完蛋。因此他們要用盡一切權力防止兩國之間各顯著困難的解決，並在美國人民決定把他們趕走並以把國家利益看得高於他們自己的利益的人們代替以前要促使美蘇人民陷於永久的敵對。

我現在還只描述了莫斯科美國大使館內少數主要的人員，還沒有詳述其他人員，由於大使館的主要職位一向是由華府國務院反蘇派的代表們担任的，在其他各章還可以看到一些詳細描寫。

我們由此可看，美國的公共輿論與美國人民幾乎完全依靠着一小群反動人員，其中包括大使館官員與通訊員，他們壟斷着有關蘇聯的消息的所有來源，因而對美蘇人民的利益發生着巨大的損害。

第四章 美國大使館的情報活動

我在前面提過，美國駐蘇大使館的工作在於獲取關於蘇聯的有偏見的消息。這工作自然不是在莫斯科計劃的，我知道有時大使館收到一些密碼電報，裏面是關於搜集可用來在美國報紙與廣播展開積極反蘇宣傳運動的消息的指示。這些用電報打來的指示都是由國務卿，或代理他的副國務卿署名的。

國務院會一再催促大使館搜集情報，供作通過美國新聞處在美國以及其他國家進行反對蘇聯及其日益增長的國際影響的宣傳。

這種指示真是恬不知恥的。國務院的首要們對於蘇聯人民的生活水準的事實與材料作有特別指點，即他們建議爲了反蘇宣傳的目的，它們是應該加以刪改與歪曲的。

有時我就感覺我是在某個情報系統內工作。我所工作的美國新聞處就是一個例。最近幾年來它容納着幾乎是專門的職業情報官員，他們不能也不會有一點兒放棄他們情報習慣的心情。

我看到過大使館的一些職員奉大使館與國務院之命令如何使用一切可能的機會獲取關於蘇聯人民生活水準，和它的民心的歪曲情報，以及蘇聯工農業等的材料。

舉例說：大使館職員到蘇境各處作業務與休憩旅行時，（在他們回到使館時）對於途中見聞，偶而會見的蘇人談話，以及這種談話裏透露出來的消息，都得寫成詳細的報告，他們奉命強調任何對反蘇宣傳有用，性質卑劣而並無多大意義的片斷消息。

我親自知道有不少次大使館的職員誇大他們在途中看到的缺點，或者就無中生有地創造出一些故事，以充蘇聯生活某些方面的歪曲了的誹謗。

所有這些事情的原由是這樣的：凡是一個大使館職員在一個報告或備忘錄中愈多反蘇的誹謗，這職員也就愈受重視。

大戰期間，大使館的職員藉口與在奧德塞、白俄羅斯、烏克蘭的美國代表聯絡或前往摩爾曼斯克、阿昌吉與海參威，在蘇聯時常旅行；戰後他們最後的目的地多半是海參威了，因為那裏設有美國總領事館。所有這些旅行都一向被用來搜集有企圖的情報的。

我可以舉出許多的例子，不過有兩個也足以證明這一點了。

美國大使館的一個參贊路克 (Louise Luke) 以前會是美國海軍情報機關的一位少校，她會去海參威旅行一次。她名義上是送外交郵件，實際上是奉大使館之命利用這次旅行探取情報。

她奉命在途中結識一些人，並記錄她在西伯利亞大鐵道沿途所看到的任何軍事設備。她同時要獲取關於西伯利亞與蘇維埃遠東人民的生活的歪曲情報，以便用於在蘇聯作反蘇宣傳。

當路克一到了莫斯科就寫下一個途中見聞的詳細報告。她寫到了所有她途中遇見的人，把他們作爲談話，以及其他的一些瑣事，包括她那火車停的大車站的食品價格等，所有這『廣泛的』消息都用最富於誹謗性的口氣寫出。我會偶爾發覺，她爲了使她的報告動人有趣，創造了一些插話。

路克自己承認她捏造了許多事實，因爲在她由莫斯科到海參威的路上她曾遇見了幾位有趣的人，她和他們一起喝酒玩牌，使她感到很高興，事實上她沒有看到一點值得一提的東西。

我還可以提一下大使館的三等秘書佛里爾斯，他也是以此出名的。佛最近去烏拉山中亞細亞與高加索作過一次類似的旅行。他在途中也認識不少人，會竭力從他們那裏獲取消息，然後用加油加醬的方法給國務院寫了一份報告。

這些『外交官』不僅搜集可以供作反蘇運動的一般消息，他們也正企圖儘量獲得純屬軍事性質的情報。

舉例說：佛里爾斯在經過的途中就計算而且寫下所有飛機場的名字，注意到停放每個機

場上的飛機數目。他企圖明瞭他途中各軍事單位的地址與實力，以及其他純屬軍事性質的材料。換句話說，佛里爾斯做着十足的軍事情報工作。

莫斯科美國大使館爲獲取下列各種情報方便起見，分設着一些科：經濟、政治、新聞、農業、領事及其他技術與行政的部門，後者是爲其他各種科以及職員們的需要而設的。

這些科的名稱說明着它們情報工作的方面。例如，經濟科搜集關於蘇聯工業生產品的質量等情報。它設有關於蘇聯經濟的卡片索引，這裏面收錄着大使館職員所搜集的及報上所得的所有情報。農業科的工作也差不多，它搜集蘇聯歷年收穫的情報，還有未來收穫的預計。

到領事科的訪客通常是些沒有國籍或現在居留蘇聯的以前的美國人。他們因各種問題而來。有些是爲詢問在美國的親戚的地址，以便恢復通信，其餘的多半是老年人，詢問和他們在美國的子女聯系的可能性。領事科的僱員大部分是情報官，他們的工作就是哄這些訪客說出關於蘇聯的情報。

在這樣的一個訪客的請求獲償以前，他要受領事科的這些情報老手盤問，他們探究關於軍事單位地點，生活水準與情況的情報（由別的城市來的訪客問得尤其仔細），還有一切有情報價值的事情。請求者自己不知不覺地就成了這些美國人的報告員。

領事官員做事無所顧忌。請求者的要求能否獲償全看他對他們回答的是否坦白來決定。

他們永遠注意於我到一個談話不倦而頭腦簡單的人，然後巧妙地令他落入圈套。他們會延遲解決他的事情，以便使他多多訪問領事科，然後給予情報的任務，迫他完成。

我知道不少這種事情。這種忍心誘騙一些老年男女進行反蘇的情報工作，始終使我深感憤慨。

領事科的情報官員迫令他們的訪客參與情報活動，會陷他們於被蘇聯當局控訴的嚴重危險，可是這些情報官是不管的。

他們只注意一件事情：搜集所有儘可能得到的情報，完全不顧他們的報告者將遭受的危險。

引起我最大憤慨的是對這些人民的這種無恥的態度，但是我要以我在大使館的地位去阻止這些美國情報官硬心腸的活動是沒有什麼辦法的。

大使館職員中的朋友，告訴我這種假充外交官的美國情報官，由於在蘇聯做特務工作很困難而又有很大危險都自己不工作，寧願要到大使館的外來人從事情報工作。

徵募蘇聯公民充間諜的困難是美國情報官們經常的苦悶。它往往使他們弄的很狼狽，而且有時候因此被迫從蘇聯倉皇退職。

由於這種情形，美國情報人員都切於避免致他們在華府的上司們的好感，後者堅持蘇聯的情報工作必須加強，要設法利用蘇聯社會內的一些傳襲『西方文化』那種奴隸性信仰的墮落

分子與渣滓。

一旦這些充當美國間諜的渣滓落入蘇聯安全當局手中，美國情報人員也就在自己大使館以及莫斯科其他外交使節中散佈『無辜人民』在蘇聯被捕的謠言。

還有比這更不要臉嗎！

當職業情報人員史密斯中將到莫斯科後，發現前任大使哈里曼有許多遺下來的做法不能滿意。哈里曼辦情報究竟還是外行，按史密斯的意見，大使館的情報工作太幼稚與天真，他把它作了一個激烈的改變。

史密斯使全使館的職員，一直到最小的書記，而且不問他屬於那一科都參與情報工作，他把與蘇聯公民發生簡單接觸，和他們談各方面的蘇聯生活，然後準備將所得重要與不重要的材料寫成長而仔細的備忘錄，作為所有大使館職員的責任，爲了這一點甚至告誡大使館職員與蘇聯人來往的緘口規律也有些放寬了。

大使史密斯與顧問杜布勞在他們與大使館僱員們的談話中都經常強調說，在情報工作上，消息無所謂重要與不重要，凡有關蘇聯經濟與蘇聯生活每一方面的瑣事都是值得注意的。

美國大使館的職員們奉史密斯與杜布勞的指示，曾在莫斯科及其四郊四出游蕩，企圖發現軍事設備的地位。如果他們做不到這一點就在市場、店舖、酒肆、咖啡館與車站等窺探，拾一些閒談與謠言，然後寫成反蘇的報告，當作由秘密特務獲得的情報，傳遞出去。它的傳

到華盛頓就出於這樣一個方式的。

顧問杜布勞有時甚至堅決主張大使館職員要把他們偶爾在城裏從相識的蘇人那裏聽到的
一些逸聞，寫成備忘錄送給他。

把上下各級職員所寫備忘錄綜結起來的事情是大使館的職員之一瑪撒·哈麗蘭的特殊業務，他另外還保存着一個大使館職員所得關於蘇聯工農業與運輸的情報檔案。

我知道有許多次，大使館的職員們爲了獲致他們上司的好感，會捏造一些詆毀蘇聯的『事實』，寫成備忘錄，假稱它們是從與蘇聯公民會談中得來的。

所有這些都被彙集起來而且歸入了檔案，大使館職員們要寫報告可以自由取用這些檔案裏的材料。大家都可以想像得到，根據這樣找來的道聽途說與片斷材料的情報，蘇聯實況會是怎樣的一種被歪曲與造作的景象。

大使館職員中也有些思想進步的拒絕這種參與情報工作的拉攏。杜布勞一再建議我寫一些關於我的熟人，我與他們的談話等情誼備忘錄。

我曾在奧德塞度過休假日，一回來杜布勞就要我寫一個我在那裏所見所聞的報告，我像我以前幾次一樣拒絕了他，並告訴他休假是我的私事，他沒有理由一定要我寫如何度過假日的報告。

有些大使館的職員對這工作非常熱心。有一位是新調組以前的代理組長伊利薩白·伊甘

。她得大使館的許可，在外積極活動與蘇聯人打交道，她寫下了所有與他們的談話，情節有時出乎想像之外，報告寫的非常細密，然後用情報備忘錄的方式送呈大使館的六個主管，她因此很得他們的垂青。

伊甘偶爾回到美國，也就爲美國一些反動雜誌寫起一些誹謗蘇聯人民的文章來。『皇冠』雜誌登過她的一篇題目『動人』的長文章『我所知道的俄羅斯人』。它就是對蘇聯生活及其人民的一種惡毒的嘲諷。她講了好些她好像與蘇聯人發生過的戀愛事情，以及在戀愛中她所知道的『事實』——統統都是憑空虛構。

伊甘除了誹謗蘇聯人以外，對英勇的蘇聯女人也作了一些嘲罵。她取笑在暗淡與謹慎的戰爭時期莫斯科與列寧格勒那些有光榮的女人的穿著；其時她們與她們的丈夫，未婚夫與兒子並肩作戰，不僅在工廠田莊上代替他們，而且，其中不少在紅軍的軍事活動中也擔任着活躍的一部分，對這樣神奇的蘇聯女人作那樣的嘲弄與譏笑的人一定自己精神上已腐化墮落的。

現在讓我們再回到美國外交使館人員的情報活動方面。美國在蘇聯的間諜活動業已遭遇一連的慘敗。爲美國工作的間諜已有大批被捕。最近有幾次是藉外交護照與報紙記者等作護符的職業情報特務被逐出蘇境。可是有一點必須指出，蘇境美國情報特務的間諜活動迄仍進行無忌。

美國的反動頭子們通過國務院與軍事方面的代理人正催促他們在莫斯科的代表，要他們

加強間諜活動。將名狼藉與被逐的情報官概由他人代替，間諜活動繼續進行。

大使館與軍事參贊辦公處的情報員使用的方法，可由最近幾次可恥的暴露加以說明。

在蘇聯當助理海軍參贊的美國情報羅拉特在諜報方面是極頂活躍的，二次大戰開始幾年羅任美國海軍代表團團長駐蘇聯阿昌吉港工作。他的正式任務是協助蘇聯當局接收由美國運到的租借物資。可是這只是他次要的工作，他在阿昌吉的主要目的是獲取秘密的軍事情報。羅拉特一到阿昌吉，就竭力要完成海軍情報局給予的指令。

一九四三年羅拉特被派充美國駐海參威總領事館的助理海軍參贊。對羅拉特而言，這職位是個昇遷，因為美國情報局特別由於太平洋戰區的重要性非常注意蘇維埃遠東。

與羅拉特一同被派到海參威的有一位叫愛琳·馬杜茜絲，她在阿昌吉充他的翻譯員。羅拉特堅持調馬到海參威是有充足理由的，因為他會令她參與間諜活動，她與他已經分不開了。

如果說羅拉特在阿昌吉進行他的工作還有所顧忌，還設法應付蘇聯的情況的話，那麼在海參威的情形就不同了。他已經獲得了某些經驗，他企圖按一個寬廣的範圍發展情報活動。馬杜茜絲已由他找到一個美國領事館翻譯員的職位，積極協助他做情報活動的工作。

馬杜茜絲奉羅拉特之命，在紅軍軍事人員，海港工人與蘇聯船主中廣事交結，她為羅拉特找一些值得注意的人，並介紹他與他們認識。

羅拉特時常被莫斯科海軍代表團的人員提起，稱為天才的情報軍官，他會一面假裝與蘇

聯友善，從而使他的蘇聯朋友獲得良好印象，一面就在杯酒之間不經意的談話中套取秘密情報。

羅拉特有時會使若干沒有經驗的人，陷於間諜陰謀的羅網中。

羅拉特爲了達成他的目的，毫無猶豫地對有些發覺他是情報人員因而不願被用作間諜的熟人，施用恐嚇與威脅的手段。

據我所知，羅拉特在海參威的工作會極受大使館首長們的讚揚。

我上面已經指出過了，馬杜茜絲是他所最信任的諜報助手，她像他的上司一樣，在他們中間交『朋友』，慷慨招待他們，而且還贈送小量禮物。

馬杜茜絲在海參威進行活躍的情報工作之後，發覺蘇聯保安機關已對她進行監視，她由於這種偵查，想到可能被捕，因而不安起來，設法到美國去。

但是太遲了。一九四七年，蘇聯保安機關逮捕了她，並破滅了羅拉特在海參威建立的間諜網。

這事件使莫斯科大使館感到空前的驚恐，特別是海軍代表團，因爲那裏的美國人都恐懼大使館的間諜活動會暴露出來。

可是美國海軍情報機關在蘇聯活動的這一個嚴重失敗並沒有中止大使館與海軍部的情報官仍繼續其不當的活動。

蘇境美國情報機關另一「傑出明星」是那海軍情報局的一位職業軍官助理海軍參贊勞勃特·吉勒歐，一九四六——四七年間，他任職美國海軍代表團，在奧德塞施展他的能力。

由於蘇聯當局對他加以嚴密監視，不允許他如意策劃其諜報，他頗以在奧德塞進行諜報困難爲苦。

吉勒歐的特殊功績是他獲得一位供職奧德塞海關的官員充當間諜，由於吉的關係，這職員與美國代表發生了正式的接觸。

我從大使館的朋友那裏知道，吉勒歐結果被當場被捕，而在奧德塞受僱於吉勒歐而到莫斯科送情報給他的那個間諜也被牽連在內。

蘇聯的報紙讀者都知道了美國記者馬吉陀夫 (Robert Masloff) 因間諜罪名被逐出境的事情，我在這裏只打算說一說馬吉陀夫的活動是什麼。他是大使館的一個常「客」，那裏所有的美國人都熟識他。

馬吉陀夫在蘇聯住了許多年，對蘇聯與俄語很熟悉，而且娶了一個俄國人，因而在蘇聯還有些親戚關係。在美國大使館馬吉陀夫被認爲一個消息靈通的人。他被認爲有用處而獲得重視。因爲他會有系統地供給關於蘇聯的情報。

大使館講到他時稱爲有本領的人，他能够滲入各處，獲得情報，因爲他始終給他的蘇聯友人以他對於蘇聯是忠實而友善的那種印象。

實際上，馬吉陀夫從來不是蘇聯的朋友，他假偽善目的在與蘇人交朋友，從他們獲取各種諜報。

我相信在麥克勞——希爾出版公司掩蔽下活動的美國情報官，是有意選中馬吉陀夫而要他搜集關於蘇聯的情報的。美國的情報機關很清楚，馬吉陀夫是通曉蘇聯情況，而且有諜報經驗的。

馬吉陀夫會竭力進行美國情報機關的命令。他經常在莫斯科遊蕩，設法打進蘇聯的科學機關，並與從事於新科學研究的蘇聯科學家交朋友。馬吉陀夫甚至向大使館報告了他的發現的極小的瑣事。

他與美國情報機關的關係照例是通過大使館外交郵包維持的。我記得當我在大使館幾次當值時，馬吉陀夫總有寄往美國的郵件送到郵件間。美國大使館就用這種方法協助馬吉陀夫進行諜報，這做法是違反外交郵政特權一種嚴重的罪行。

當我知道蘇聯當局決心把這種可耻的情形消除時，我毫不奇怪。

第五章 美國新聞處與美國的宣傳

除了戰略服務局以外，戰時情報局（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又在一九四二年成立。它們雖然密切關連，但任務有所不同。

『戰時情報局』雖然表面上是個宣傳機關，實際上有它諜報的作用。

『戰時情報局』在大戰時的正式任務是在美國，盟國地區，中立與敵對各國傳佈消息與假消息。

記者與廣播評論員艾爾默·台維斯（Elmer Davis）曾被派為戰時情報局局長。

戰時情報局設有一個特種委員會，內中包括國務院，陸海兩部及其他部門的代表。

戰時情報局利用它在盟國與中立國家的正式分支機關及新聞代表進行它的情報與宣傳活動。

該局除在美國及國外進行情報與宣傳外，在美國還負有檢查新聞的任務，而且擔任美國政府的一種正式的新聞發佈機關，發表官方公報與文告。

戰時情報局的分支機關設於國外所有美國的大使館內。其中有一個設於莫斯科美國大使館。它的職員們在分發美國出版物與電影的假託之下，積極進行情報工作，假文化與宣傳工作之名，他們與蘇聯人結交，並設法從他們中間獲取美國情報機關注意的情報。

大戰之後，戰時情報局與戰略服務局的一部分都併入國務院，成為國際新聞與文化事務局，戰時情報局原設大使館的分支機關也配合了這個改組而有所改變。大使館內設了一個屬於國務院國際新聞文化事務局的新聞機構。

我對於大使館這一部分最為熟悉，它名叫『美國新聞處』(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這機構在蘇境正式從事於散佈美國宣傳。它在莫斯科維斯寧街設有一個辦公室，而它的工作是由美國大使館節制的。

我在美國新聞處的機構內工作為時約兩年半。這期間我担任着行政與其他負責工作，因此對於這機關所有各方面的工作及其計劃都能相當明瞭。

在蘇聯美國官方宣傳的兩個主要途徑是俄文雜誌『美利堅』與由『美國之音』廣播的俄語節目。

兩方面的宣傳材料主要是由僱用許多白俄的機關在華盛頓與紐約製作的。

『美國之音』任用白衛軍分子不僅充當無線電報告員，也充當俄羅斯事務專家與無線電廣播顧問。這些『專家』擅長於對蘇聯人民作有系統的無耻挑撥，『美國之音』從他們得到

些什麼建議也是可想而知的了。『美國之音』每天用這些白衛軍顧問的可厭的謾言污辱『以太』，它完全不理會它處的是怎樣的一種可憎的境地。

值得注意的是，不僅經國務院經辦『美國之音』廣播的一部分講教這些卑污的挑撥者，國務院反蘇派的主要人員也與這些在美國白衛軍組織的代表們維持密切的聯繫。

在美國的俄羅斯法西斯黨巨魁房西亞特斯基於一九四七年刑期未滿而由獄中釋出一件有非常象徵意義的事情。一九四二年他因為幫德日在美國作諜報，曾被聯邦法院判處長期監禁。

國務院反蘇派的一員史蒂文斯 (Garci's Stevens) 曾娶一個俄國移民。人們也知道史蒂文斯夫人會出力將另一白俄移民巴恩絲 (Yoris Barrow) 拉進國務院。國務院會立即派她連她的丈夫到莫斯科美國大使館工作。

巴恩絲受僱於大使館的時間與我相同。事實上他是美國白俄各方面在美國駐蘇大使館的代表。她的態度是極端反蘇的，她不僅對她當大使館經濟科科長的丈夫發生巨大影響，而且也有效地推行國務院所予的命令，即對大使館其他職員進行反蘇的蠱惑。

當巴恩絲在莫斯科時他曾告訴我，她的母親與以前的托爾斯泰伯爵夫人一起住在紐約附近的里特田莊。巴恩絲自己也與托爾斯泰伯爵夫人非常接近。兩人都竭力進行反蘇的煽動。巴恩絲的過去也是很多波折的，她是以前奧德塞一家咖啡館內出衆的歌女，以後在俄羅斯

內戰時逃往國外。

任何人不能否認國務院對於『俄羅斯專家』的條件具有『自由思想』，我們在這裏一起已看到了一位羞辱了她偉大的父親的名聲的前伯爵夫人與一個前奧德塞的咖啡館的歌女。

這些受美國當局津貼的白衛軍分子除了充美國外交界『顧問』作煽動活動以外，還進行着另一差不多可惡的任務。他們是反蘇黨感與在所謂流亡人民的假名之下向南北美輸出廉價勞動的搨客，在這種所謂流亡人民中有些是被迫出國的蘇聯公民。換句話說，他們實在協助着美國反動派進行奴隸買賣。

美國外交方面高級首長們的甜心蜜語並不是以掩蔽真實情況。他們虛偽的演詞會企圖隱匿他們支持並積極使用這輩被趕出國外的小群特徒完成反蘇目的的事實。

這些關於『美國之音』電台人員的敘述已使我認識了本題。

莫斯科美國新聞處對指導美國的宣傳政策，建議並報告那些雜誌與廣播節目的效果，與發行『美利堅』雜誌等都佔有重要地位。

不錯，莫斯科美國新聞處還有其他作用，它在推行一個所謂『文化聯絡』的計劃，使用的是電影，爵士唱片，美國『滅菌』標本等。

美國納稅人所購置這些貴重的物品，大部分可在大使館職員們私人的收藏處發現，實際上其中沒有一個是用來推動『文化聯絡』的。另外，招待方面用的錢也確屬不少。

一般說，美國新聞處，特別是莫斯科的一個，是浪費着政府的金錢。貴重的書與其他財物已消失得無法查考。財產目錄所顯露的事實被小心地了結掉以避免指責。有許多情形在我進去以前發生過，以後我雖然設法制止其中某些事情，可是這種惡劣做法繼續不輟是在意料中的。

大批經費用在出版『美利堅』上。這雜誌從封面到封底全用着光滑的紙張，裏面有許多翻印的五彩圖畫。這做法是出於大使館的主意，目的在使雜誌儘量『豪華』，使『天真的蘇聯公民』相信美國的『富庶』。

美國宣傳的巨頭們不算政府支付編輯、作者等人的薪給的費用，誇稱這雜誌是自給自足的。其實這薪給超過了出版這雜誌所有其他的開支。

莫斯科的美國新聞處是人浮於事的。這是由於那些薪水高的參贊們名義上是主持機構的，實際上只管私務與陰謀，而全部工作全由屬員們去做的緣故。

按美國人民的觀點來看，這種浪費是說不通的。

莫斯科美國大使館甚至不知道每月送到莫斯科的五萬冊雜誌是否有人閱讀。像大使館財物的散失一樣，『美利堅』的命運也是一個小心隱匿的事情，特別是對出錢的美國公眾要隱匿的事情。

大使館的人員都很清楚而絕不令美國民眾知道的事實是『美利堅』在蘇聯並沒有許多人

看，看的人則並不加以重視。

它裏面的文章在於揆合一種天真的認識。它描繪了一個密密地包在玻璃紙中的美國，這裏的農人的手似乎從來不會髒，這裏的工人在董事會宣佈利潤高達百分之五十時還向董事會致賀，這裏每個人住着十五間房的屋子，每年的薪水二萬，不做什麼事情而免予徵稅。

它既不能欺騙蘇聯讀者，也不足引起他們興趣，蘇聯人並不希望被當成傻瓜。

在這種情形之下，美國大使館一旦發現了一個讀『美利堅』或讀過它的蘇聯人就當成一件大事。一個美國人在蘇境各省旅行，在某地遇見了一個讀過『美利堅』的蘇聯人就足以使他為大使館寫一個奇長的報告，向國務卿打個專電，以便它有自信地向國會報銷。他們根據這一點，就說『美利堅』在遇見這一不平常蘇聯人的地方是收獲宏效的。

我知道有好些次大使館的僱員曾付與旅費，被派往遼遠的地區旅行，目的就在搜集這樣的情報。如果他們能在莫斯科到海參崴途中發現一個『美利堅』的讀者就認為自己很幸運。這種關於『美利堅』反響的『消息』受大使館異常重視，因為它藉此可提出更多經費的要求，用在這種荒唐的事情上。

我記得在大使館引起非常興奮的『發現』是有幾本『美利堅』在維斯寧街被竊而賣在『黑市』裡了。大使館為這事情也拍了一個急電到國務院，建議將這種『大事』通告國會議員們，這事情被說得好像『美利堅』獲有廣大的讀者要求，可是實際上，這一點足以說明這

種幾乎等於免費而可作多種用處的刊物才有旺盛的要求。

國務院得到的報告說，這些被偷的幾本『被以高價非法賣出』；這話是不確的。實在這幾本是美國新聞處的職員故意留在外面，因而才被偷去的。

另一個詭計是：將一些『美利堅』捧在莫斯科各處的垃圾箱裏，以便那些清道夫與傭人檢出給他們的朋友看去。

大使館的美國人會奉命搭乘公共汽車，電車與地下火車，漫遊莫斯科，『忘記』一些『美利堅』在座位上，以便讓一個或有的『熱心』的人我去一看。

國務院的這種『高貴的』出版物有時被遺留在莫斯科公園裏的座椅上。在蘇聯旅行的美國人也奉命隨帶幾百本『美利堅』，一路遺散在車站的食堂裏。

有次美國新聞處收到了一封給編者的信，處長會因此立即去看了大使一次。只要信（罕有的信）上贊同或稱譽了一篇文章，處長也就一定要向大使報告了。這種信是那樣的少，據我知道，某些僱員就經常收受不少津貼，寫一些這種信，簽上假名，然後寄到維斯賓街來。因此美國政府又用了納稅人的錢償付了這種讚揚那雜誌的信件。

『美國之音』廣播節目的反響也是用同樣方法去搜集的。

對於『美利堅』雜誌連大使館內最樂觀的首長們也不相信它的效果。可是那些負責人對於『美國之音』還存有巨大希望。他們對它估價極高，因而國務卿特別助理與蘇聯事務獨佔

派首腦之一波倫特地指派了他的姻兄弟賽佑指導俄語廣播的編輯。

在這些蘇聯事務「專家們」的想像中這個廣播節目將成爲幾百萬蘇聯家庭睡時的催眠曲的。它用美國各廣播公司向美國聽衆推銷肥皂的方法向蘇聯人民推銷美國文化與美國的對蘇政策。

可是對美國廣播聽衆與蘇聯廣播聽衆之間的主要的不同，國務院是忽視的。

一個美國人收聽時轉去一個推銷肥皂的節目，討厭地又轉到了另一個推銷肥皂的節目，事實上美國廣播中大部分節目，都是推銷肥皂、飲料、香烟及其他貨品的，收聽廣播的人絕少選擇餘地。

可是在蘇聯，「美國之音」播送的美國節目很可能被轉去，而另外收聽歌劇，音樂演奏，演說，新聞與話劇等。

沒有一個正常的人在可以收聽愛好的蘇聯音樂家舉行演奏時願意去聽那些神經失常，拙劣而操古老俄語的美國宣傳的。

事實是「美國之音」在蘇聯並不成功。雖然在蘇聯任何人可以買一架收音機，他愛聽多久就聽多久，可是「美國之音」是幾乎沒有聽衆的。

美國大使館是知道的，但美國民衆受着蒙蔽。國務院的代表在機密的談話中告訴國會這節目是很受歡迎的，全蘇聯都有人收聽。

自然美國政府所辦對付蘇聯的官方宣傳計劃有它更荒謬的地方而浪費美國金錢是真的，可是我們要從這些事實作結論說它並無更嚴重的含義是錯誤的。

美國新聞處計劃是美國官方對蘇政策的的一部分。它是反對蘇聯及其人民的一種武器，它受國務院內外控制美國對蘇外交全部計劃的一批人所控制。

因此由國務院全部活動這一個比較小的範圍來看，也可以看到國務院與美國駐蘇大使館的官員自己所設想而執行的美國官方政策。

這些廣播爲了遂行他們主要的任務，往往故意宣傳一些假的景象與想像中的美國生活，從而狡猾地暗示蘇聯收聽者，一個『人間天堂』只有在資本主義之下才有可能的。

舉例說，『美國之音』播送一次一個美國工人的訪問，那工人談論他那新建的五間房間的家屋。他沒有說到這房子已以百分之九十的價值抵押掉，這筆錢他要化三十年的功夫才能償清，如果這期間他失業了，那末他就會失去他的家屋及屋內其他一切，被擱到街上。他沒有講到幾百萬美國工人以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收入支付房租，而且生活在陋屋內，其悲慘情形正是蘇聯人所想像不到的。他說他有一輛新的福特汽車。他並不說他這汽車是用分期付款辦法買的，如果他一旦失業的話，他不但會失去那個車而且連已付的錢也一併失去。他並不提起大部分美國工人並沒有新的福特汽車。

總而言之，『美國之音』的『訪問』發表的是美國生活一種歪曲與捏造的報道。國務院

廣播中所描繪的美國從沒出現，而且永遠不會在資本主義之下存在。

『美利堅』雜誌給它讀者的也是同一歪曲的報道。所以它的文章描繪一種不費勞力與不費心思的生活，充滿了最好的奢侈品，應有盡有。

『美國之音』播送着美國外交政策故意虛飾的調子。在這種廣播中美國國務院被描繪成一個經常被『好戰的』蘇聯所抗拒的『和平天使』。

自然，即使是美國宣傳計劃中最圓滑的說謊者，也難於說明為什麼美國政府如此不願意與蘇聯政府坐到一張會議桌旁並切實解決美蘇糾紛。同時它也難於解釋美國外交政策的另一特點，即它策劃的一個侵略事實遠比它一百萬句婉轉取媚的話更為響亮。

事實是即使是想出這種『巧妙』計劃的美國官員中最樂觀的人也不相信他們會有什麼機會可以說服大批蘇人，使他們相信美國目前的外交政策是『愛好和平的』，或者資本主義優於社會主義。

他們認識，蘇聯人民是愛國而忠誠的，而且最主要的是受過政治教育的，因而他們信任他們的政府與社會主義。他們知道蘇聯人民大部分對美國宣傳是完全不受感動的，對美國不得已天真的『路線』不會受到一點兒欺騙的。

不過他們在莫斯科開辦美國新聞處，情報工作還是比宣傳做得多。

莫斯科美國新聞處的大部分主持人員都是受過情報訓練的人，這點決不是個偶合。

在哈里曼任大使時期在莫斯科主持美國新聞處（其時叫『戰時情報局』）的費里普斯（Joseph Phillips）是西點陸軍大學的畢業生，一個『退休』的軍官，在四十年代，他曾先後在蘇聯，意大利等國作新聞工作，二次大戰時又復員任陸軍上校。費里普斯在他服務期間顯然始終與軍事方面維持着密切關係。如所周知，『退休』的陸海軍官往往是美國情報機關的重要特務，費里普斯的落入這一類尤有可能。

費里普斯離職後，伊甘主持了美國新聞處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她是一個與蘇聯交往的活躍人物。她在『戀愛』的掩護之下獲取情報，然後報告給大使館內某一人員。

伊甘的職務後來由魏里斯（Armond Willis）接替，魏一直担任到一九四七年初。魏里斯曾在柯羅拉陀州波爾特地方海軍情報訓練班內受訓。

韋廉斯（Melvin Williams）是美國新聞處的副處長，曾受訓於同一學校。一九四七年發生『魏里斯醜聞』之後他被迫離開莫斯科。

韓遜（Joseph Hanson）一度代替過韋廉斯，他是與戰略服務局有關係的。

魏里斯而連任美國新聞處長到現在的是羅格爾斯（Mervyn Ruggles）他是被美國情報機關派到莫斯科『買蘇聯書籍』的。

美國新聞處於戰時在莫斯科成立以來，顯然所有担任負責地位的人都與情報機關有密切聯系或至少受過情報訓練的。自然，一看美國新聞處計劃的性質，這情形是不足怪的，但是

它的確是即便在美蘇兩國爲共同對希特勒作戰而密切聯絡時期，美國政府所抱兩國「文化聯絡」思想的一個生動的說明。

我已經指出魏里斯、韋廉斯等人會因「不充分了解任務」而被黜職。可是事實是他們的被選顯然是由於他們有資格，包括情諜訓練在內，他們的不能收獲成功，那是選他們的人錯，而這種錯已被迅速改正。

我曾經指出我談到的一些人是執行上峯人物的命令的人。而這些上峯人物與情報活動也有密切關係。J·查維斯、杜布勞、賽佑、愛倫等本身就是間諜，並與其他間諜密切聯系。美國外交部整個是個情報機關。

在我任職於美國新聞處與華府國務院期間，我每日與許多主持這一宣傳計劃的最重要人物討論過「美國之音」與「美利堅」雜誌的作用，這些人中間包括杜布勞與J·查維斯。我看到過材料是怎樣編的，看到莫斯科給國務院關於美國新聞處工作的批評，我看到美國諜報活動與「美國之音」間的密切關係。我是唯一可看到這一點的人。魏里斯作的聲明不包括我說到過的一些事實，而且也顯示其他方面的一些事實。

魏里斯事件洩露了這些控制「美國之音」與「美利堅」的大使館與國務院的官員的方法與目標。

魏里斯於一九四六年被派到莫斯科主持美國新聞處，他天真地認爲他的被派是爲了發展

文化關係與美蘇人民的交往的。

魏里斯怎麼會誤解他的任務，怎麼會想到他可能按他自己的想法工作，一句話，怎麼他會有這樁不夠的『政治準備』與訓練，這些問題是很難了解的，也許只能這麼說：國務院內某人出了一個引起大使館真正風波的嚴重的錯誤。它充分顯露了大使館首要們的操縱其間，結果魏里斯被革職並送回本國。

魏里斯的被派是假設為宣傳工作的，因為選他的人們認為他是海軍情報訓練班裏受過俄語訓練的以前海軍軍官，他該知道執行大使館關於新聞處活動與這工作的情報任務的命令的紀律的。

可是魏里斯雖是政治思想上的保守分子，有他獨立的主見，因而拒絕按上峯希望去推行破壞蘇美友誼的活動。按他的經歷來說，他去相信國務院公開的表示，他竟望促進美蘇之間的相互了解與文化關係，他實在犯了一個極頂的嚴重錯誤。他認為這種文告比讀莫斯科大使館當局給他的指示更有權威性。（大使館的指示與『友善的』公開文告是絕對相反的。）他就沒有想到這種公開文告只是蒙蔽美國人民不令知道為侵略的反蘇政策準備的一種烟幕。

自然大使館是不能了解也不能容忍這種『荒謬的天真人物』的。

首先，它設法破壞魏里斯在大使館內的地位，要他自己的部下反對他，阻止他指揮他自己的新聞處工作。其次，在最短期間，爲他作了『調』離莫斯科的『安排』。

魏里斯感覺到周圍發生的變故，他既不是一個溫順的人，也不是一個懦夫，因而他竭力抗爭。

當大使館最後告訴他調往布達佩斯的決定時，他知道了他們的用意就是把他由莫斯科調到一個比較靜僻的地方，然後把他革職，不用怕醜聞外揚。於是魏里斯不走，向國務院辭了職，然後在離莫斯科前，向一位美國記者發表了一個刺激的談話，抨擊大使館的領導，揭露了大使館的職業官員們正以『反蘇』及『仇蘇』作為發展官運的門徑。

大家都知道，這時國務院會竭力防止魏里斯的談話作廣泛傳佈。而且他們對這位指責的魏里斯作了有計劃的行動。

史密斯大使申明魏里斯的調任是因為『他不稱職』——這是個奇怪的說法，因為他就從沒有機會執行他的職務。

他企圖公開地對魏里斯事件付之一笑。私底下大使館的官員們就堅持說魏里斯實在是一個『共產黨人』，在那時到莫斯科採訪外國外長會議新聞的記者們就散佈這個謠言。

同時，大使館爲了『報復』，使美國保安當局將魏里斯列入黑名單，使他以後再不能在美國政府內擔任官職；大使館主要的官員在與我及別人私人談話中甚至於承認，他們這麼做完全是爲了儆戒或有的魏里斯第二。

由於其時我在新聞處工作我本人與魏里斯是熟識的，而且每天看到大使館一等秘書了。

台維斯給我的關於如何不問魏里斯經辦新聞處的指示。我還看到在幾個月期間台維斯如何以大部分精力狡猾地企圖『叫魏里斯好看』與污辱他的名譽。

我會被J·台維斯仔細地問到我所關於魏里斯在辦公事內的活動，他的私生活，他的政治見解等情形。美國新聞處的其他職員也受到過同樣的詢問。

我從他問的問題中知道J·台維斯是在幾方面下功夫。首先他企圖獲得證明魏里斯是個『懶而拙劣的工作者』的材料。其次，他企圖獲得可以讓他向大使館當局報告魏里斯是個親蘇分子或確是共產黨的材料。第三，他使用着他那一類思想的人相同的策略，希望有人能說明魏里斯是個同性戀愛者或與大使館同事發生非法性關係的人。由於魏里斯生活正常，人人知道，因此這最後一個企圖實在是最下乘而荒謬的。

台維斯最後找到了一個魏里斯由基輔旅行回來後所寫的報告。魏里斯所寫完全是真實的見聞。他訪問過集體農場，並與基輔若干知名人士作過談話，他的報告除見聞外，並沒有加添什麼東西。繳呈這種報告猶如向一頭野牛揮動紅巾。台維斯會因此怒不可遏。因為他曾經告誡過，任何報告在拍往國務院以前必須有所『說明』——自然是根據反蘇的方針。台維斯得到大使館內他某些阿諛的『專家們』的協助，指責這報告，並稱它為不合要求與親蘇。這一次的詭計，在魏里斯調任的按排中起有主要的作用。

對於魏里斯的副處長韋廉斯用了直接與間接的種種壓力。在客氣與不客氣的暗示中，韋

廉斯被通知，如果他能供給不利於魏里斯的情報，那麼他在魏調走之後，可以繼任魏的職位。

章廉斯要維持中立，也出了錯誤。因此，以後他像魏里斯一樣被撤職並喪失了他在國務院發展『大好官運』的機會。

我本人並不喜歡魏里斯，也不是他的朋友之一。可是我對他對報界發表談話揭露大使館的陰謀與『仇蘇』的勇氣，不容不加以讚揚。

魏里斯的談話消滅了他在政府機關的官運，他爲了生活必須在政府以外找工作。這是他企圖與國務院蘇美事務獨佔者們開火的代價。

魏里斯事件的發生我是一個目擊者，這事件也是我所能想到關於大使館當局所一向施行卑劣陰謀與誹謗藉以推行其政策，消滅國務院內部異己的一個最好的例證。

魏里斯以後由 J·台維斯自己挑選的人——羅格爾斯接替，此人現在還担任着這職位。

羅格爾斯具有會計員與私家偵探的綜合頭腦。我上面已提到過。他的被派到莫斯科是爲那些主管對蘇情報的機關買書，獲得所有各種可得的著述，特別是工藝著述，這種著述在華盛頓將被通盤審閱，採取或有的情報。他很可能還負有其他任務。

由台維斯與杜布勞之流的觀點看來，羅格爾斯是個理想的選擇，因爲他沒有獨立的性格。他完全是個小的做官主義者，也許他在國務院之外，就找不到事情做，同時他除了奉命之

外什麼也不幹。

他的作用就是充傀儡，什麼人也不得罪，執行一些杜布勞直接給他的命令。自然他是有權作建議的。一般感覺他的所以被視為有用就是他的情報經驗。

魏里斯被逐後，大使館就因為韋廉斯於他們的反魏里斯指責運動中不合作，與他為難。魏里斯離職後大約三個月，韋廉斯被召，並通知他的工作業已『取消』，他必須回美國去。

他不知道在他返國同時另一個人被派繼任，而且做的也就是以前賦予他的工作。究竟『替換』怎麼能替一個『已被取消的』工作那就一直沒有加以說明。不過包括韋廉斯在內的大家都知道，這只是擱走他的一個方法而已。

韋廉斯他看到過魏里斯的遭遇，他發現了自己這種兇兆，就投降了。他不作什麼不妥貼的指責，離蘇後，前往柏林進美國軍政府工作。他委滯沉默不曾維持了他的官運。他已經受够了教訓。

被派繼韋廉斯職位的是羅格爾斯的密友韓遜。韓原在大使館工作，在大使館向以百依百順出名。

以羅格爾斯換魏里斯，以韓遜替韋廉斯，這種替換無疑為國務院蘇聯事務獨佔集團對莫斯科美國新聞處建立了直接控制。

自然，魏里斯並不是大使館首領們經常控制新聞處全部事務的眞正障礙。命令是直接發

給一些下屬的，他們接到無須注意魏里斯有什麼建議的通知。不過，魏里斯的出現就是J·合維斯、杜布勞一幫人所要忘却的一個美國的日常工作提示，——就是有一種美國人民，他的大部分是獨立的，不顧政府的目的如何，自有他們的意見，這些美國人中雖有不少保守分子在內，都是深切地盼望與蘇聯人民友善的。

我在上面指出過，大使館的戰時情報局，以後改稱為美國新聞處，它在莫斯科的工作從一開始就掩護着大批正規的情報官員。

這些人在過去有費里普斯上校、伊甘、魏里斯最近有羅格爾斯與韓遜。後面兩人是以前戰略服務局的正式僱員，他們在美國新聞處內的工作只是他們活躍的情報工作的一種掩護。一九四四年羅格爾斯是戰略服務局編譯參考科的科長，該科集中着所有討論蘇聯問題的官方出版物。

據大使館內流傳的謠言說，羅格爾斯來莫斯科負責採取技術情報的特別指導。

當我與羅格爾斯共事，充他的行政助手時，我確信他利用他的正式職位掩蔽着他的主要工作。

根據我的觀察，我可以說他曾經着手搜集並直送華府以關於蘇聯的情報。

像大使館所有主要人員一樣，羅格爾斯對蘇聯及其人民的態度是極端不友善的。舉例說，我記得羅格爾斯曾在一次談話中預言美蘇之間將發生戰爭而勝利將是美國的。他說在那種

情形之下，他最所喜歡的是回到蘇聯任某個城鎮的『鎮市長』。那時他將給俄羅斯一看他對他們的真正態度！羅格爾斯一說到俄羅斯人就從不猶豫地用最卑劣的口吻去污辱他們。

這是一個被假設來蘇聯主持美國新聞工作並『促進』美蘇間文化關係的美國情報工作者的一個簡短的剪影。

在莫斯科發生關於魏里斯的糾紛時，華盛頓也正展開了控制美國宣傳計劃的鬥爭。

蘇聯事務獨佔派於賽佑獲得主持俄語廣播的工作時，打贏了一個重要的據點。

以後曾任美國駐伊朗大使的愛倫 (George Allen) 被委任為主管對全世界的美國新聞處計劃的助理國務卿時他們獲得了另一個勝利，一個更重大的勝利。

愛倫的發跡在於他在德黑蘭時拍發了一些比其時莫斯科大使館發生任何東西更激烈地反蘇的電報。愛倫在德黑蘭對伊朗內政加以個人的干涉證明了他是一個反蘇外交官的能手，因而獲得以現在的職位為報酬。前任的班敦 (William Benton) 由於不能滿足外交上的要求終於被黜。

莫斯科美國新聞處或華府國務院內某些集團的秘密陰謀的所以重要與值得談論是因為它有政治意義，它正是那一派決心使美蘇之間永遠不能有和平的野心人物加強其權力的武器的緣故。

第六章 美國大使館的投機商

在美國，商業與投機事業之間並無界線。低價買進，高價賣出，可能時合法地進行，有必要時就非法地進行，誠實有用處時誠實地進行，要圖厚利時就不誠實而用大量的欺騙去進行，這不叫投機，一定叫商業。商業帶來高的收入，而在美國，收入與社會地位相偕而俱來。

在美國重要的事物是錢，不管他的來路如何。在美國每有一個在法律範圍之內以『誠實努力』獲得收入過活的人，就有三個以在其他社會將坦白地指為搶掠或劫奪的方法而致富的人。

如所周知，約翰·洛克斐勒是仗着艱困，不名譽而卑劣的狡計以及盜竊（這種行為決不是千百萬用於慈善事業的錢所能洗刷的）方法而致富的，他的子孫在社會名錄上就比雖然不苦的安迪生的子孫列得高。在美國某人如果以兩倍於他所付的代價而賣出某些物品的話是個大傻瓜。

投機深入於華府政府的內心。去年大家知道首都就有些高級官員（包括杜魯門想任爲海軍部長的鮑萊（Patley），總統私人醫師以及數以百計的『小人物』）會利用政府賣買穀物的機密情報在五穀市場進行投機。由於大選年正當接近的時候，這些人被共和黨所抨擊，可是沒有一個人由於他這種活動的結果受到什麼懲罰或者不便。

在國外的美國人是特別熱心於投機的。在美國本國，投機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是種職業，而且只限於人口中比較小的一部分。可是在國外投機熱似乎傳染到了所有美國人，不分年齡老幼，職位高低，政府人員或民營公司僱員。自從大戰開始以來在歐洲各處都是如此，至今還繼續不輟。

這種美國人中有些做咖啡與香烟生意，另一些買整個公司，以低價或不付一文收進，然後賣出圖得大財。

意大利人都知道誰在意大利以貨品供應黑市。每個德國人也都知道誰利用他在變佔區的艱困與飢餓迫他賣出家私財物換進香烟與咖啡。許多奧地利人也都知道誰以在浮吉尼亞與北卡羅林納製造的香烟賺他們整個國家的錢。各種各樣的美國商人都心存一種恐懼，即他們今天如果不吞佔了全部利潤的話，另一個美國人就佔先吞佔了去。

國外那些誠實忠厚的美國人看到這些情形頗感不安，對這種局面頗爲憂慮，但也無能爲力。

有人要干涉這種情形的話，在他們發動以前就被背後的人所制止，而且會被開革，或調到別的地方去。那些要不受這制度影響的人，結果也熱心參加而且特別多做，以便補救他們過去喪失的時機。

在這種情形之下，美國外交官員從上到下也都從事或大或小的投機是毫不足怪的，他們的企圖把這種美國道德輸入到蘇聯來也是毫不足怪的。

在莫斯科美國大使館幾乎每一個人都或多或少地做些投機，或者用外交封包的辦法非法輸入蘇聯貨幣，或者利用外交人員關稅優待輸入免稅酒類與香烟，然後高價賣出獲取宏利。

有些作大規模投機的大使館職員已將非法利潤累積起來的萬千金元寄回家裏，有時就用貴重藝術品（根據外交上特許出口）加以掩蔽，有時就是現款與支票，這種事情雖然大使館內人人都知道，沒有一個人會因為這種投機行為而被國務院所開革，至於憑外交護照旅行的最大投機者自然更不在話下。

雖然大使館內常有冠冕堂皇表面上嚴格的條例公佈出來，可是要在大使館內部取締這種投機是不可能的，這種條例只有援救面子的問題，沒有人相信投機在大使館內會被消除。

這是什麼原因呢？

舉一個例就足以說明投機在大規模地進行。

一九四七年末大使館會進行一次調查，查誰在投機，用什麼方法，有什麼後果。這裡應

該指出，調查進行時蘇聯的幣制改革一事已經使投機更加困難而更少誘惑力了，而且調查目的不在發現投機的真相，或僅少許短時的投機者被找來作爲大使館的替罪羊，目的是專門在爲那些大做投機的使館高級人員粉飾。

當時設的一個委員會包括大使館海軍與陸軍的代表，這委員會召見了所有的職員與官員，並訊問他們關於投機的事情，鼓勵他們談一談別個同事的事情（特別是後者如果是些下級僱員）。

大使館出席該委員會的代表就是在莫斯科的那位高級的職業外交官，顧問杜布勞，大使館許多僱員都知道他是大使館內最活躍的投機商。

舉例說，有些職員確實知道杜布勞經華沙到蘇聯時會在那裏黑市中以只及法定匯率十分之一的代價買進一大箱盧布，他利用外交上免稅的優待帶到了莫斯科，供他自己私人使用，很可能他利用與大使館會計方面接近的人熟知的方法賣出後又變成了金元。

有位有個長時期和我住在一個公寓裏的少女不僅直接知道這種交易，而且把事情報告了國務院。杜布勞就因爲她知道這些怕她，後來終於把她調離了莫斯科。

杜布勞另些方面的投機活動也爲大使館許多僱員所知道。在這種情況之下調查的沒有進展與不受尊重正是意料中的事情。

當我被該委員會訊問時，我拒絕提供關於這方面的消息，因爲事情很清楚他們會加某些

罪名於某些小而無力抗拒的人，然後報告國務院調查業已證明沒有『外交人員』牽涉於投機活動。

事實上的結局也的確如此，被選中的一個犧牲者是相當可愛而對人無害的人——牙醫生的助手。在報告中他被正式指控為投機的主要人員。另外一二人被控牽涉於類似的活動，以後這些人都被送回本國。所有『外交階級』的人都被開釋了罪嫌，仍留在蘇聯或其他地方繼續其投機活動。

我舉出這個例子是因為它說明了大使館內最高級人員參與投機活動的程度，並且由於他們這些人私下對於投機具有持續的興趣，要他們制止投機活動是做不到的。既然這些人投機，也就不可避免地為下級人員所知道，因而他們也必須容許下級人員的投機。事實上他們也時常在他們自己的機構內利用這些下級人員的。

甚至史密司大使也不免於干犯這種可憎的投機活動，他從事於某種與他美國駐蘇聯大使這一崇高地位極不相合的秘密買賣。

有次為大使管些私事的『萬能博士』班特爾（Bentley）告訴我他在商業冒險上某些失敗，他說史密司要他到市上出售的衣服自來水筆與香烟實在沒有銷場，可是他的上司正需要償付貨款了。

大使館另一位當信差的職員柴哥羅特尼告訴我，他常常奉大使私人的命令去賣掉些金

關——美國售價十元古巴售十鹿素的金關——和錶，柴文自誇說，他最近賣掉了價值二萬五千盧布的金關與錶，這些都是史密斯託他賣的。

這些是莫斯科許多美國人都知道的，自然它爲全體美國人作了榜樣。

在莫斯科的美國人投機的方法是怎樣的呢？

第一個是（或者說過去是，因爲蘇聯實行幣制改革以後這辦法已變成幾乎不可能。）利用外交上特許的優待，非法輸入貨幣。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以前，外交官可到德黑蘭、華沙、布加勒斯特、布達佩斯與其他都市去旅行，他們可以在那裏買一些蘇聯的盧布，其中大部已經作廢，那些地方的兌換率是一美元換六十至一百盧布，而外交官在莫斯科的法定兌換率是一元換十二盧布。因此他們可以利用外交上特許的優待，將收購的盧布輸入蘇聯，或供私人之用或按二十至三十五兌一美元的兌換率換給其他美國人。結果是許多美國人賺飽了美元。

其次，是非法販賣免稅進口的貨品，舉例說一條香烟連寄費可以一元美金買到——按外交匯兌率就是十二個盧布，在莫斯科出賣，可開價一百至一百五十盧布，合美金八元五角三至十二元半。這些盧布貨款可以變回來成爲美金，也可以來購買古物與藝術品，其中有些是非常值錢的。

最近十年來，美國人曾違反蘇聯出口條例輸出許多俄羅斯的神像。這種神像被以高價

出售，獲利極大。

有些美國人——爲數不少——離蘇時攜帶二打至三打的箱籠，重量往往到一二噸之巨，這決不是誇張的話。所有這些箱籠可按外交上特許的優待免受蘇聯海關人員的檢查。

我知道實在沒有一個在莫斯科大使館工作過的職員回國時不攜帶貴重書籍、珍珠、古玩與攝影機的。

第三個方法是在莫斯科美國人之間或其他外國使領人員中進行非法的美金買賣。在蘇聯實行幣制改革以前，美金票通常比官價高三倍到六倍。

怎樣證實這些罪狀呢？首先，在蘇聯生活過的任何一位誠實的美國人能證實這種情形。在大使館工作過的那一個人都知道這事情，而且知道那些美國人能經常無限制以及法定匯率一半的價格出賣盧布。可是這裏也還有其他更具體的證明。

舉例說，查一查到一九四六年夏末爲止大使館官員們的賬，可以看出大戰期間以及大戰後一年半之間，在大使館工作的美國人就沒有經過官方機關（大使館與蘇聯銀行）買過一個盧布，有時所買盧布只有名義上的數目，聊備一格。

由於按特別的外交匯率兌換的地方只有大使館與蘇聯銀行，因此上面這情形是國際黑市活動的充分證明。（大家知道大使館人員是些手面很寬的用錢的人）盧布顯然是在各處按較好兌換率獲得的。這事實也就說明美國的一些納稅人被剝奪了，因爲對於這些在莫斯科工作

的美國人美國政府一向是按十二比一的盧布兌換率給予很高的特別津貼的。換句話說，大使館人員是利用着大使館人員個個知道的虛偽口實獲得着特別的贈與。

一九四六年夏，所有職員奉命購買盧布，不過只是生活津貼這一部分。從那時以後的紀錄顯示至少到一九四七年底，實在沒有一個人購買盧布到多於他絕對需要用以買東西的數量。

合法地購買的盧布的數量是不足以維持其時美國人的生活的。這可以查一下大使館大多數美國人向大使館提出的生活費報告就可以證明了。他們提這些報告是爲着向國務院要求撥給莫斯科人員更多生活津貼的。這些報告列述大使館大部人員的開支，如果加以研究並與他們個別實在購買盧布的數量一比就可以發現大約有四分之一到一半的必需盧布是合法購買的，而其餘的數目就是通過投機交易的。目前莫斯科外人的投機仍在繼續，但是蘇聯政府已使這種活動愈益困難。

另一個核算辦法是查一查這兩三年來包括軍事人員在內的外交人員旅行情形，記錄可以看出享受外交優待的官員到莫斯科來有大部分是通過有貨幣黑市的華沙與其他地點的。幾乎所有這些外交官都時常到有黑市貨幣的華沙、布達佩斯、布加勒斯特等地旅行。這些外交官的活動是一群人一群人幹的。往往一個人外出就替三四個人購買盧布。這是沒有外交優待特權的大使館低級職員們所熟知的事情。由於低級職員需向這些高級職員購買盧布，這就成了

大感不滿與壞情緒的一個來源。

還有一個證明可由大批寄到大使館，或給它職員的大量貨品中獲得。蘇聯海關對於這些貨品一定留有有趣的數字。它們可以說明到最近為止，莫斯科的美國人，不論男女老幼收到的貨品每人合到每年幾噸的數目。而且這些數字還可以說明：平均每個美國人每月購買一瓶以上到兩瓶的酒，每星期二條到三條香烟。它們還可以說明：在配給實行時雖然美國人獲得極端寬大的糧食配給——舉例說：比英國的配給多二倍至三倍，並高過於美國平均每人的食物消費量。——美國大使館仍輸入大批食品，數量大過於它所得蘇聯配給二倍以上。美國人顯然是爲了投機而進口，他們在市場裏賣出大量酒類，香烟與食物。

除此以外，進口的還有大批傢俱，衣服與其他個人家俬。海關的紀錄還可以說明，當美國人離蘇時，傢俱與汽車幾乎都不帶走的，雖然國務院能爲這些東西付運費的。換句話說，它們是在市場上賣掉的。

一九四八年這種活動大減。應該指出這一點不是出於美國大使館主動的結果，雖然它有些商店櫥窗調查與嚴格條例的發佈，可是由於高級外交官既是投機圈內的主要角色，沒有人希望執行，也沒有人能執行。投機的減少是蘇聯政府新主義的結果，它設法防止了美國人免稅貨品向莫斯科無限制的進口。

現在大使館已有一個進口限額，它可以在限額之內輸入它所要輸入的東西。它是一個大

限額，全年達二十萬美元，大使館有關的每一男人、女人與小孩都合到一千元。

蘇聯政府不干涉它限額以內的進口，但是它提出了制止大量非法進口的辦法，而且正式實行了。

除了進口限額以外，每一個新到人員准予携入他的全部家俬，數量可多至五噸至十噸，完全免稅。此外，外交人員可以携入至少一噸加蓋外交印章的貨品。最後，每月寄到大使館的外交郵包爲數有幾噸，其中一半都是大使館人員私用的衣服及其他物品。

可是這樣的情形仍不免叫美國大使館把蘇聯政府不准它爲投機目的無限制輸入免稅物資的問題鬧成一個大的國際問題。有人甚至用蘇聯這種自衛性的措施作口實，揚言斷絕外交關係。另一些人不平地說他們沒有這種免稅進口貨不能生活，甚至要在美國報紙上鬧成一個問題，說他們自己已陷於飢餓。

自然，這問題並不成爲大使館美國人有什麼困苦的問題，因爲他們駐留的國家正是糧食充足與歐洲少有的幾個取消配給的國家之一，這已是他們的特權。這問題是：莫斯科的美國人是否應任令以免稅的進口貨品進行無限制的黑市活動與投機，因而在一個把投機當罪行來處罰的社會主義國家遂行其資本主義的精神制度與行爲。

目前美國人的投機活動的困難也由於蘇聯的貨幣改革，它取締了在外國大量購買作廢的盧布，非法進口，然後在蘇聯舉行的議會。

可是美國人是頑固的，他們一定會儘量利用他們的權力去恢復接以前規模的那種投機。在他們整個經歷中，他們喝免稅的威士忌，抽免稅的烟，享受免稅的生活津貼，住免稅的公寓。可是除此以外，他們還要從事於投機性的『商業』交易。在西歐、中東、南美與非洲各國，美國外交官都進行投機，他們可以逼迫各該國政府同意他們用來出售的美國貨品的無限量的進口。他們認爲這是他們的主權，而且正企圖將這種做法推行到蘇聯來。

我大部分寫美國人在莫斯科的行爲，這是因爲我是在大使館工作，而且夜夜都聽到關於香烟、衣着、汽車與麵粉等零售與批發價的『黑市談話』。可嘆的是全世界各地美國大使館都以不同的程度進行着這種事情。

光是爲了說明美國外交官精神墮落這一點，這問題就值得以那麼多的篇幅來談一談的。還情形顯示，那些雖然經過高度選擇而一般地過得去的人們，由於在視劫掠爲光榮的國家內生長，所業已墮落的深度。這些人即使到了社會主義的境地上也不能改變他們的本性。我舉出的一些事實，說明這些人對於充當可尊貴的美國人代表一事是多不關心，而那些高級的外交官們熱中投機又如何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這些情形是美國駐蘇官方代表的道德水準。

第七章 爲什麼美國統治者耀武揚威？

當我回想到在美國的生活時，有一個可憂而陰沉的印象蓋過了一切。我記得報紙上巨大的黑字標題預言着一次新的戰爭，鼓吹着一次新的戰爭。我至今仍聽到那些步戈培爾後塵的無耻的戰爭宣傳家們稱揚戰爭是最歡樂而最有利可圖的買賣，不管我是多痛心，我必須認識戰後的美國是在史無前例的戰爭心理狀態中了。

我在職業上不是一個經濟學者也不是個社會學者，我也不敢冒充爲美國社會與經濟的專家。我只能談談那些能閱讀與客觀而獨立地觀察的普通人所知道的一些事實。我願意以普通人的地位解釋一下今天美國發生的事情。

自從德國失敗，大戰結束，爲時業已三年，但是美國陸海空軍仍維持着經過動員所得的力量。我們的部隊幾乎遍佈着全世界。

戰後美國在軍火上已花費了幾十億的金元。原子彈工廠仍在經辦。大批新的款項已撥交了空軍。美國海軍在許多方面都具有戰時的實力。一個徵兵法已提付表決，這是美國平時歷

史上第一次。軍事用費吞佔了我們巨大預算的大部分。

最後，大家知道一次新戰爭的宣傳已經達到一個前所未聞的程度。戰爭販子不僅未受懲罰，而且正多方面地受到鼓勵。

我要說的不僅是那些報界的敗類如皮爾遜 (Drew Pearson)、溫契爾 (Walter Winchell)、奧爾索普 (Apsop) 兄弟之流，他們每天在報紙與廣播中贊揚與倡導一次新的戰爭。主要的美國政府官員，包括武裝部隊的首領都在公開號召不經警告即向『敵人』『投以原子彈』，作爲『預防的』措施。聽一聽我們那些將軍們的演詞，人們就可以知道襲擊旅順港與珍珠港的那種譎詐的範例已不是日本，而是美國傳統的一部分了。

我確信我的一些蘇聯朋友一定明瞭所有這些危險的玩火舉動都與美國人民的精神不合的。我敢斷言我們的蘇聯朋友們一定能在美國人民與那些噪音響亮的冒險家一派人之間分清界線的，後者一向無禮地假美國全體人民的名義發言。這也就是我爲什麼要指出美國戰爭心理的真相並說明它的真實動機的真正原因。

美國所有耀武揚威與軍火製造的事情，戰爭販子們都以蘇聯這方面對世界和平的『威脅』作理由，他們說蘇聯正圖獲取『世界霸權』。可是即使是美國那些知名的『俄國問題專家』，例如某些最反動的記者與國務院代表，他們一面熱心於支持美國擴軍的計劃，一面也完全知道蘇聯並不要戰爭。我恰巧知道有幾次連莫斯科美國大使館內一些最狂妄的反蘇分子也

私底下承認這一點。

自然，誰能否認蘇聯已經復員了它戰時的軍隊，而復員後的退伍軍人已在田地、工廠以及其他平時事業方面工作的事實？你怎麼能掩蔽接連三年，蘇聯的軍事預算一年比一年減少，而且並沒有提出什麼特別的戰爭用費的事實？誰又怎麼能忽視蘇聯業已提出十五至二十年總括性與五年為期精密性的種種經濟計劃？

雖然美國政府領袖們散佈着一種神話，說蘇聯把大部分國民收入用於備戰，可是美國的統治者群完全知道蘇聯正用全力於求經濟的恢復與發展。蘇聯的軍力並不像美國軍隊一般遍佈於世界；它們是在國內，在蘇聯，現在只有少數佔領軍隊留在奧地利與德國，履行國際協定。蘇聯政府會正式建議在最近將來和約完成之後，從這些地區撤退其部隊——但以美國及其他佔領部隊一同實行為條件。蘇聯領袖沒有在報紙、廣播或集會中作過，或打算作什麼威脅任何人的公開言論。蘇聯的普通人也沒有作過這種言論。

因此蘇聯人不要戰爭，蘇聯不要戰爭。那麼誰要戰爭呢？為什麼美國從事於狂熱的擴軍呢？這問題的答案應從美國社會與經濟制度的弊害中去找。

從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九年之間，美國一直陷於不斷的蕭條。工業生產低落。所有工業只使用着一部分的生產力，另一方面農產品找不到市場，同時付與農民的代價也悲慘地低。十年間失業現象持續着，受影響的身體健全的人有五百萬到一千五百萬，他們甚至希望

按其時富於代表性的令人饑餓的工資的工作也不可得。這國家的景况每况愈下，穀物於許多人饑餓時減產，工業生產於人們正需要消費品時作了限制，只有戰爭的來臨才使美國的經濟以充分的速度與全部生產力進行，戰爭對美國資本家是一種恩賜，因為他們從中獲得幾百億元。應軍需定貨之需要，新建的工廠風起雲湧。美國工業生產量有了非常的增大。

可是戰爭結束時發生了什麼呢？軍需工廠與一般工廠失去了他們的軍事定貨。生產減縮了。

有些不明資本主義經濟規律的天真的讀者也許會問：『這有什麼關係？只要把軍需定貨改成平時民用貨品定貨就行了。使兵工廠不造砲而造為人民的貨品！』這確實是蘇聯解決其復原問題的方法。但是在資本主義國家美國，事情是不同的。資本家關心的主要是利潤。資本家只願生產一定量的貨品，而且一定在一定價格作有利可圖的保證下生產。當物價漲時，一般工人與農人的收入就減少了，於是貨品就沒有市場了。這結果就是一種新的危機的鬼怪，比我們經歷過的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九年間的蕭條更壞的又一次蕭條。

這是美國那些將國家投入於新的擴軍熱的人們以及發動獲取世界霸權的人們所作冒險計劃的根源。

華爾街的巨頭要想成爲世界所有貿易市場無容置疑的霸主。他們夢想着滅盡他們的競爭者，使美貨泛濫於全世界。最後還有相當重要的一點，由於巨大的軍需定貨，他們的利潤正

在增漲，美國政府正以美國納稅人爲犧牲，將定貨單送給工業財團。他們的利潤激增不已，猶同『舊時大戰的日子』一般。

另一點不容忘記的是：讓武主義的誕生預定了內部政治制度一定趨於半法西斯，或甚至於純粹法西斯的直接改變，在這種制度之下，積極反對美國統治階層冒險政策的『過激分子』『共產黨』及其他不滿意的分子將以警察行動與逮捕來壓制。

如所周知，這一點在現在比美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更爲明顯。戰後美國瘋狂的間諜案，無計數進步分子的被捕，一連串反勞工法律的通過，許多美國公民基本政治自由的被剝奪，已成爲政治本色，我同我們人民一般羞憤交加，必須承認美國戰後的行徑正與德國於二次大戰以前可怕地相似。

有人也許會問我，美國常對世界宣示，它是民主的聖地，爲什麼新戰爭的宣傳者與策劃者的活動在美國不受懲罰呢？

我要回答這個問題又必須考慮到美國的某些特別的景象。我已經指出過，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中賺飽了錢。自然，華爾街的巨頭們首先就增大他們的財富。但是我們如果不看到其他階級的美國人也分得着某些戰時利潤的事實的話，那是錯誤的。這情形相當影響着美國的整個政治形勢。

我願以一些具體例子來說明這一點。

約翰·瓊斯是紐約的一個銀行家，他和他的夥伴染指於美國所有的企業。瓊斯自己就在一家汽車公司，一家飛機製造公司，一個巨大的電影公司的董事會內佔有席次，他與那些老板們向他借款的廣告業與報紙都維持着密切的私人關係。他和他時常給與『好處』的一些參議員與閣員都是親密的朋友。

蕭條期間，瓊斯的公司賠錢，他自己也感到了蕭條的影響，他個人的收入由一九二九年的一百萬元跌到幾年之後的幾萬元。大戰時期他終於收回了他蕭條時期的損失，而且比一九二九倒霉的年頭更富有了。他個人投資與爲他的銀行所控制的公司賣了數以十億元計的貨品給政府。

他現在又大發利市了，他向國外擴展其業務，在英法德收買一些股權，在日本與中東建立了強固的立腳點，瓊斯是贊成驢武主義的，因爲大砲與軍火上每多化一元錢，也就是說他所代表的公司與他自己更多賺了些利潤。他自然贊成馬歇爾計劃的，因爲馬歇爾計劃保證他在西歐自由行動，擴展他的金融與商業活動。他贊成美國在外國的經濟與政治的擴張，因爲他的思想就靠這種擴張來體現的，他不反對與蘇聯作戰的思想，因爲他知道蘇聯具有世界上最大的資源，而他很想揮手於這些資源。

他知道只有在美國造成一種戰爭心理，驢武主義才能『出售』於美國人民。現在戰爭心理正由瓊斯與他公司投資的報紙，他有股份的電影公司製作的影片以及瓊斯銀公司所支持並

靠瓊斯供給的廣告維持的廣播在鼓吹。他的意見正由那些競選時瓊斯捐款協助的參眾議員的提案在反映。

而且瓊斯是不孤獨的，因為像瓊斯這樣的人數以千計，有些較大，有些較小，而想法都一致，都怕經濟危機，都把招致戰爭的政策當作出路，瓊斯與他的朋友們影響着公眾輿論。

現在讓我們把社會階梯頂端的瓊斯撇開來看看『較低的梯級』吧。

約翰·史密斯在一家工廠內工作。他讀一些反映銀行家瓊斯意見的報紙。他頗受迷惑，他在政治中找不出個頭緒來。不過他記得他在四十年代流浪街頭，捱受饑餓與痛苦。

他記得他一直到一九四〇年才找到工作，他在工時內有工做，工資頗高；逾時工作，工資加倍。他現在每星期只做三十五小時了，但是他知道如果他的工廠能有軍事定貨，他將獲得每週五十至六十小時工作，收入可加到三倍。他在原則是反對戰爭的，但是他確實希望他的工資增加三倍，即使工作辛苦些也無妨，因此他只有不去想他那工廠在平時所出槍砲可能作的用途。

杜伊太太的丈夫是個農夫。在四十年代他們喪失了他們自己的田地變成了佃農。他們斷手斷足地勞作，可是總在賦稅之下抬不起頭來。可是大戰發生後，糧價漲了，農產都有了市場。杜伊並沒有出征，他因為是個生產的農人免於兵役，他們買了他們的田地，買了些新農事機，而且還在銀行裏存下了一萬元。

戰後，杜伊夫婦倆就開始擔心他們是否能賣出他們的麥子了。他們贊成馬歇爾計劃，因為他們聽說這樣他們的麥有了市場。像史密斯一樣，他們看那些代表瓊斯觀點與說蘇聯要發動一次大戰的報紙。他們並不贊成戰爭，但是在上次大戰中，麥賣了那麼高的價錢！因此他們爲倡導招致戰爭的政策的人投了一票。

我在這裏決不是說所有工人都與史密斯一般想法，所有農人都像杜伊夫婦一般想法，但是誰要是忽略了我們確有不少人像他們一般想法的可悲事實，那就錯了。這些無知而被騙的人由於他們的被動，任令瓊斯擺佈了。

不消說，美國另外有數以百萬計的人民知道在這個原子時代，戰爭對於美國就等於自殺。每天有更多的人明瞭了華爾街冒險家們的政策將領他們到那裏去，他們開始吶喊了。我確信這個進步的美國有它的作用的，不過在今天美國發命令的是瓊斯之流。他們是國家真正的霸主，他們把國家像他們自己的辦公室一般在管理。政權在他們手上，被他們用來使美國最後走上舉國自殺的道路，我想這正是四十年代希特勒重整軍備時德國發生的情形。

這是我們現在想到美國首先湧現的印象。這也就是我今天所以不願在美國生活，願意留在多方爭取世界和平的國家的原因，後者已經發現在和平的路上雖有不少困難，維持不斷而迅速的進步是可能的。

第八章 我對於蘇聯的印象

在我來莫斯科以前在國務院的時候就有人告訴我，蘇聯人將怕我，不願和我交談。

我到莫斯科後幾個星期之內，發現不僅我所接觸的許多蘇聯人不怕我，自由地和我談話而且他們都是誠摯、友善而直爽的人。我後來認識，他們實在比我以及莫斯科領事館內任何其他一位職員所敢於預料的還好看，因為我們這些人都想到大使館每天都在推行破壞美蘇友善關係的政策，並使用大批金錢於反對蘇聯人民及其政府的情報工作與敵對的宣傳。

我到莫斯科來以前聽說，我一到莫斯科就不可能出城旅行，還說蘇聯當局將竭力阻止莫斯科的美國人參觀蘇聯並熟悉蘇聯生活。

當我到莫斯科之後，發現不僅可能自由而無何干涉地在莫斯科之外旅行，而且莫斯科內外的地方當局，博物館，文化機關，歷史性建築的管理當局等都對找他們協助的外國人概予協助。

我發現有許多美國人曾在蘇聯各區旅行，未受干涉，當局還給予種種協助，並在旅途中

加以款待。我自己曾去許多城市訪問美國朋友與蘇聯朋友，還參觀了莫斯科四週的古蹟，我住過旅館，參觀過博物館，寺院與教會，從沒有被拒絕或被嚴厲地對待。我參觀過鄉村學校，教師們都請我以及我們伙伴中其他人員接受他們的招待，並告訴我們他們的工作與問題。

我清楚地記得我曾在莫斯科附近一個集體農場農人的家裏的一次小坐。我們中途遇雨，到他家裏去避雨。他邀我們進去，並款待我們以午餐，吃了黑麵包、火腿、番茄、胡瓜、茶葉與伏特加。

他告訴我們他的兒子已在前線戰死；他自己也曾打過德國人，然後回到他的村莊，重建他被德國人破壞了的房屋。他告訴了我們他還要過更美滿生活的希望，以及他如何去獲得這種生活的打算，他舉杯祝賀美蘇之間的友誼。我們告別時，他還邀我們有機會再去看他。

我一回到莫斯科立刻發現許多美國人正無比粗俗地妄受蘇聯人的款待，而且使用他們旅行莫斯科以外地方的自由進行間諜活動。他們的旅行用專撥的公費開支，得到情報就送到國務院。這些報告却是誹謗招待與協助這些作者的人們的。

我所憤慨的是，那些自由地在莫斯科與較遠地方旅行的美國人就是傳佈他們『未准旅行或與蘇人相識』的謊言的人。如果這些美國人中有人由感到現在旅行已不如一九四六與四七那麼容易的話，那麼該罵的就是他們自己。蘇聯人顯然知道，這些客人訪問他們是爲捏造污

辱的誹謗與套取情報的。

我們華盛頓與莫斯科美國大使館都聽說，蘇聯是在準備對美作戰，爭奪世界霸權。

我發現每一個和我談過的蘇聯公民都有要求永久的世界和平的熱望。我與蘇聯各界人士的談話中，發現共產黨黨員，政府官員都像所有其他蘇聯公民一般強烈地希望與美國之間能有長期和平與友善關係。

我發現縱使那些反蘇思想的美國政府官員對蘇採取公然敵視的態度，蘇聯人還是一致友善地對待美國人。

在華盛頓以及大使館我聽到蘇聯人民是被有計劃地供給着關於美國及其人民不正確的新聞。

可是我發現許多蘇聯人對於美國生活，文化與政治都具有深切的了解。我還發現有許多美國作家在蘇聯也像在美國一般有名，作品被時常閱讀着。

有一次有位朋友年方二八的女兒來看我。她問起我美國的生活與美國的文學。她以令我吃驚的熟練程度談論馬克吐溫、柯伯、德來塞、辛克萊、路易士、史坦培克等作家。我相信，她走時是失望的。她希望知道一些她所沒有讀到過的美國作家，可是相反，她向我說起了一些我所沒有讀到過的作家。

我發現普通蘇聯公民都具有關於美國的正確知識，比一般美國人對蘇聯生活的了解為高

，同時蘇聯對於美國生活的誤解則比較少。我發現蘇聯並沒有一種旨在迫使蘇聯民衆怨恨美國人民的新聞攻勢，可是在美國，據我所知，報紙與廣播的全部力量都用在反對蘇聯人民的。

我在華盛頓聽說，所有蘇聯公民都『恨而且怕他們自己的政府的』。這已證明完全是假話。我與幾十位蘇聯公民談過，發現他們對於他們自己的政府，黨以及他們的領袖具有最高的信任與尊敬。

我特別要指出，蘇聯公民是世界上最富於熱情的人民。他們會幾次在前線與後方以生命報效他們的國家，而且他們有隨時再度抵制敵國的準備，不問敵人是從那裏來的。

我發現蘇聯公民對他們的領袖斯大林元帥具有巨大的愛與尊敬。而這種敬愛完全建立在下列這一每一蘇聯公民都知道的事實，即斯大林供獻其全部生命於蘇聯人民、蘇聯在歷史上最危急的時候是仗着他的識見與決心援救過來的。

一年前某一個明朗的日子，我訪問一位在莫斯科的女朋友，她那一家住的一間大而寬敞的房間陳設非常簡單。牆上有張斯大林元帥的像。這是全房間唯一的一張畫。我問她的父親是什麼心情使他掛起這張照片。

他以堅決而驕傲的口氣說：『一九四一年十月最艱困的日子，斯大林與我都留在莫斯科。許多神經較弱的人都很吃驚。有些人會說莫斯科一定會失於德國人了。我們都知道我們的

遭遇如何，我們會聽到過一些從德國人那邊逃出來的人說，其他的城市在敵人手裏如何遭受屠殺與搶掠的情形。我不怕說，我當時心情也有些慌亂，但是我堅持在車床上的工作，因為我知道我製造的子彈是用的那方面的。」

他接着說，「我們知道斯大林是和我們在一起。他主持着莫斯科的防衛。當我聽到這消息，我正在工廠裏，我記得我與我那工廠其他工友的反映。我們知道斯大林同志領導着我們與其他幾百萬工友與士兵保衛我們的首都。我們爲生產子彈一天工作十二小時，十四小時以至十六小時。我們一直工作到我們精疲力盡，我們就在工廠裏睡幾小時，睡後又做。我們知道斯大林同志會領導我們通過最大的考驗而獲得勝利。他領導我們得到勝利。他使我們免於德國的奴役。我不是共產黨人，但是在這樣一個領袖之下工作，我認爲是一種值得驕傲的特權。這就是爲什麼斯大林的像掛在我家裏最受尊重的地方的原因。」

我在國務院時聽說，所有蘇聯人民是經常生活在蘇聯秘密警察生殺予奪的恐懼中。這又是謊話。我從我自己的觀察和與蘇聯人談話中發現他們認爲他們自己是自由的，事實上他們也確是自由的；他們認爲他們的政府是公平的，他們也確是公平的。

我發現極小極小一部分蘇聯人，他們企圖犧牲許多同胞福利來自肥，在晚上不能安睡，因爲他們知道蘇聯的司法機關將破獲並懲罰這種罪行的。

我發現企圖出賣蘇聯國家利益的人，是受極嚴的處罰的。不過這樣的人爲數極少。我發

現忠實的蘇人爲人口中絕大多數，安眠好睡，相信他們的權利與自由是非常安穩的，因爲蘇聯國家小心地戒備着犯罪分子的謀叛與剝削。

我在國務院時聽說，在蘇聯，俄羅斯人剝削着其他的民族。可是我自己看到蘇聯是世界上唯一在法律上與實際上維護完全的種族平等的。

所有蘇聯公民，不分宗教，民族或膚色，具有同等權利，同等特權與義務。我發現所有各民族的人民，不受歧視或偏袒，具有從事於任何有用活動的機會。

我發現蘇聯這國家有幾十種民族和平相處，並獲得發展他們民族文化的充分機會。

我記得有次晚上我在莫斯科一家餐館內慶祝一位蘇聯朋友的生日。在一間屋子裏同座用餐的有蒙古人，卡薩克人，愛沙尼亞人，烏克蘭人，猶太人，俄羅斯人與阿美尼亞人，都按他們自己的方式自娛。每個人都感到自己是全體的一部分，而餐館的門也什麼人都可以進來，不問他的膚色是黑的或是棕的。不存一點種族偏見。有一位俄羅斯人和一位阿美尼亞人坐在一起，那阿美尼亞人發動了一個關於莫斯科與艾勒凡（Erevan）兩地氣候優點的爭論。他大聲說話，室內那一角落都能聽見。爭論發展到俄羅斯與阿美尼亞的一般相對的優點。由於這個愛鄉的高加索人的情緒激昂不已，使我感到他們恐怕會打架了。爭辯如此激烈，以致引起了全廳人的注意，並驚動了餐館經理人員。以後我轉了一個身，發現兩位『敵手』已在握手。那俄羅斯人手裏執着一杯阿美尼亞出的上等白蘭地，而那阿美尼亞人執着一杯莫斯科

伏特加，相互敬酒，阿美尼亞人祝福莫斯科，俄羅斯人祝福艾勒凡。

我會聽過那穿着華麗服裝的著名的歌唱家與演員卡嫩 (Tamara Khanum) 歌唱十六國的民族歌。她每唱一個歌時，穿着那一國精美的服裝。在我看來，卡嫩正是中亞細亞人民在蘇聯生活中業已達到的境地的象徵。她的歌在俄羅斯人爲多數的聽衆中引起的采聲正是蘇聯人民認爲所有蘇維埃國家的文化都是他們自己的的一個有力的證明。它同時也證明他們相互贊揚與尊重別個民族的文化。

我在電影、藝術、文學、科學、體育、政治生活與政府活動中看到蘇聯各處所有非俄羅斯人都具有與俄羅斯人同等發揮他們的創造力，進行負責工作的機會。

我在大使館中聽說所有蘇聯婦女被強迫進工廠，聽受剝削。

我親自看到，特別是我離開大使館以後在蘇聯人中生活時看到，只有在這個國家，女人在法律上與事實上都與男子具有同等權利。只有在蘇聯他們獲得同工同酬，而且只有在這裏婦女才真有機會升任最負責的職位。世界上沒有別個地方有像這裏那麼多婦女參加醫務、科學、藝術、文學與工程的。

我在這裏會遇見不少在各種生活方面擔任負責職位的婦女。在我的朋友中有一位是女科學家，斯大林獎的獲得者，列寧勳章與勞動紅旗勳章的得主。她的研究聞名全蘇，可是她也還有時間管她那兩個孩子的家。由於他的名聲煊燾，也許有些例外，但是在我看來，她正好

是成千成萬在蘇聯科學，工藝與藝術方面担任重要工作的婦女的象徵。

我知道蘇聯政府確立了一個照顧工作的母親的孩子的制度，它允許母親既有職業，又是個母親。

我自己就領受過蘇聯政府爲母性的照顧。當我懷孕時，我得到幾個月免費的產前看護。當我最後幾星期不能去衛生所時，就有一個看護像到其他我認識的產婦家裏一樣工作。當我須去產院時就有一輛汽車派到我的公寓來，這車是專爲接送產婦的，由產院所置備。

在產院裏我享受到充分的醫護。醫院設備與食物，都是免費的。我的孩子接生後和我一起在產院被照顧了十天，我沒有付一分錢。這不是爲我的特別規定，而是蘇聯每一個母親的權利。在那一個別的國家還能找到這種良好的照顧？

在美國我的朋友生了孩子，要爲產前檢查付錢，爲接她們到醫院的汽車付錢，爲醫院床位付錢，爲食品付錢，幾乎連他們在那裏呼吸的空氣也要付錢。當他們回家正最需要免於煩惱以及照顧時，賬單送來了，賬款計達五百元之巨。

幾月以前我訪問了莫斯科一個保育院。院長是個大約四十歲的婦女，她自己有個家，很愛兒童，她介紹了她的那群小朋友，替我介紹了她管的小孩子。我從來很少看到這樣康健而快樂的小孩子，他們是肥胖、結實、忙碌、好玩、愛建築，是的，有時還打架。他們在這裏享受着一切有父母的孩子的照顧，也許比有些生活在家裏的孩子受到的照顧更周到。在我看

來，他們正是蘇聯國家對兒童所有照顧的象徵。

我從與許多蘇聯婦女的談話中得知，她們的生活不像美國的有錢人家婦女那樣無聊與空洞，也不像美國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工農的妻子們那樣困苦。蘇聯婦女知道，她們不論在那裏工作，工廠、田莊、辦公室或學院，她們不受剝削，她們自己享受着她們勞動的果實，她們對於建立一個偉大國家與一個新社會作着貢獻。

我在國務院與大使館內聽說，蘇聯只有那些「特權階級」的子女才能受到高等教育。

可是我發現每一個蘇聯青年只要他能通過考試都可以受高等教育，實際上大部分學生唸書都由國家給公費，可以專心於學業不必擔心經濟上的需要會壓迫他們完成學業以前中途輟學。

我發現只有在蘇聯工人才能在工餘在廠內靠公費上課，成爲工程師與技術專家。

當我分晚後休養期間有個婦女來幫我料理家務。她是個單純快樂而誠實的人，她來自一個農家。她丈夫在莫斯科一家工廠內工作。他們是一個普通的家庭，像全蘇各地其他成千成萬的家庭一樣。她有三個小孩，二女一男。她的兒子大戰歸來，得有幾種褒獎，現在莫斯科大學讀物理。他已決心做個研究工作。他以後還須下很久苦工，但是他得有國家的獎學金，他能自給，不成爲家庭的負擔。他能像其他數幾千計的蘇聯學生一樣，靠他的獎學金讀畢全程。她告訴我，她的一個女兒已讀完了音樂學校，即將進莫斯科音樂學院，她有志於成爲

一個合奏提琴家。第二個女兒還在高小，但有志於進外語學院，對於英語已經很熟練。她有一天來訪問我，練習她的英語。

我已經認識蘇聯的人民有一種受教育的刺激，因為他們知道他們熟悉某種業務一定有個職位可以給他們的。他們知道他們是被國家需要着，國家保證他們有他們本行的工作。他們永遠不用怕失業，不用存美國和其他所有資本主義國家的人們所常有的無用場的可怕感覺。那些國家的人們會失業，被迫靠政府小額補助金，或私人救濟過活，或者就是捱餓。

我親自看到只有在蘇聯年老工人繼續工作而具有他們永遠不會被開革而留出空位讓年青力壯的人來替代的充分信心與認識，只有在蘇聯每一個人都知道只要他願意而且能工作，職位終是有的。

我看到了在蘇聯每個人生病時都能得到醫護與住院，不用付費。蘇聯工人顯然都很安心，因為他們知道，生病與意外都不會令他們喪失家屋與積蓄，終於被驅逐到街上，貧困而且負債。蘇聯沒有一個工人被迫靠慈善救濟得到他的醫藥上的協助。

我在國務院與大使館內聽說，蘇聯的生活水準是世界上最低的一個。我又聽說，蘇聯的戰爭破壞無比巨大，除非它得美國貸款，需時數十年才能修復，重建各破毀城市與鄉村，使這大國家重新振作起來。我聽說蘇聯正以最大努力從事軍火生產，打算用以發動新的世界大戰。

當我一到蘇聯，我看到了任何在莫斯科的美國人只要他要看到的事物。我發現蘇人雖受大戰最嚴重的影響，但在一九四六年他們已經比歐洲其他人民吃得多人，過的比較好。我發現蘇聯人中沒有飢餓，他們衣服够溫暖，有屋住，而且都有職業。

我親自看到戰前用於建設莫斯科的這種巨大努力已將革命以前的一個僅有木屋與卵石路的大而散漫的鄉村變成爲一個大的現代都市，這裏有壯麗的大路與方場，有大而美麗的公寓，還有世界上最新式的地下車道，設有最新式實驗室與設備的巨大教育機構。

我發現早在一九四六年，戰後復元已經有很大的進展。我看到蘇聯恢復其經濟，雖無外援，可是它貨品的生產已有迅速的增加。一九四六年末我曾看到蘇聯人民如何以刻苦與對將來的信心去應付由於那年史無前例的亢旱而產生的困難。我看到了這些希望是怎樣被實現，此後工藝業又如何以世界其餘各地聞所未聞的速度進展。

我看到在一九四七年蘇聯怎樣取消了配給，而一下成爲歐洲唯一沒有配給制度，沒有黑市而有充足食糧的大國家。

我看到物價在世界其他各國增漲不已時，蘇聯的物價怎樣地在不時降低。

不久以前，我訪問過莫斯科附近伊斯特拉區戰時曾被德人焚爲平地的鄉村。當德人離去時，不讓一間房屋存留。現在一點破壞的痕跡也看不到了。由蘇聯政府協助，原先有房子的地方都造起了新的房子，大多數新屋比原先的還好。我經過烏克蘭各城市時看到戰時破壞的

房屋又如何迅速重建起來。有許多居民是自動利用空餘時間按重建計劃在工作。

在莫斯科，我每天看到新的事物。從我的窗口，我可以看到新的街道正在鋪築。城內各處都在種樹，公園也在開闢。地下車道又開築了一個新的部分，離我家不遠，年內大部可望通車。

我的朋友告訴我，他的公寓裏現在有煤氣了。他們已拋棄了以前用的那種普拉默斯式灶與電爐。街那一頭正造着一所新公寓，城內各處都有這種新房子落成。有幾百人家將搬進這種舒服而新式的公寓裏去住。街上行駛着新的新式公共汽車，新的蘇聯汽車正大批地在出現。

我會看到戰時出坦克大砲與彈藥的軍需工業改變為製造平時用品如汽車、拖拉機、新機車等的工業的具體例證。我看到新的消費品如何迅速地出現於市場。我看到蘇聯政府對於擴展平時生產付於巨大的注意。

幾個月以前我經過白俄羅斯火車站時我看到由德國回來的退伍軍人，他們都是由德境蘇軍中解散出來的小伙子。他們將回到工廠與農場中工作，不少將進學校唸書。他們個個都滿面笑容的。

在另一方面，我在大使館時知道美國人正以在蘇聯四週建立基地，不斷以戰爭威脅蘇聯政府，不斷增大美國龐大的海空軍，為陸軍徵兵等行動，迫使蘇聯將它一大部分的生產繼續

用於軍事方面，因而延緩平時工業的進展。可是按我這樣沒有經驗的觀察者看來，這種恫嚇是沒有用的。蘇聯政府能維持它的軍隊到足令這種耀武揚威歸於無效的程度，同時他能爲了他戰後復興與發展平時工業與農業而推行它的五年計劃。

西歐那些國家，所受戰爭損失比諸蘇境發生的可怕的破壞只是渺小的一部分。可是它們向美國求『援』，嗚咽得像窮親戚一樣。它們接受援助的條件將使它們的人民永遠遭受美國的經濟剝削。蘇聯剛剛相反，有它自己驕傲而獨立的辦法，它不僅勝利地應付了它自己的問題，而且多方協助一些決定不受美國務院干與的國家。

當英法人像可憐的乞丐似的伸手向美國國會請求布施時，蘇聯人正揚眉吐氣地在邁步前進，我自己寧願挨餓而不願到人家櫥房門口去排隊求乞，我喜愛並贊揚蘇聯人民，因爲他們有勇氣，有獨立精神，有辦法！他們不僅不接受國外爲自由人民所不當接受的『協助』，而且衣食都已經比那些接受美國供應的失面子國家好。

我在大使館與國務院時聽說蘇聯人『未開化』而『野蠻的』。我發現事實正好相反。不僅我所遇見的蘇聯人的智識程度遠比一般美國人高，而且西方文化的真正價值是在蘇聯保存與發展着。蘇聯人不僅充分熟悉西方藝術、文學、科學與文化，而且幾百年來一向對西方文化作着某些最主要的貢獻。這種形現在正在不斷發展。蘇聯公民仗着他們深刻的知識與了解，爲西方文化添加從蘇聯人民偉大而非常的文化中獲得的豐富貢獻。

在蘇聯，知識分子拒絕盲目地接受現在西歐國家與美國流行的那些文學、音樂、建築、哲學與其他文化部門的退化標準。只有在蘇聯這些人類的努力沒有鑽進牛角尖。蘇聯抵制各種攻擊而保存各種古典的價值的功夫可以蘇聯共產黨最近關於蘇聯音樂的文告作最明確的證明。所希望於作曲家們的是他們重振偉大的俄羅斯與西方作曲家的遺產，寫真的音樂，而不依循公式主義的道路，公式主義只足以使他們變成像辛特米斯（Hindemith）粗聲的那種毫無價值的音樂的作家。

如果世界樂壇上出現一個新的悲多汶或柴可夫斯基的話，那他一定是出於蘇聯的作曲家群中間，而不出於美英法那種音樂衰敗的情況中。

只有在蘇聯，文化與宣傳，報紙與廣播用合乎人們需要的方法，不向讀者與聽眾腦子裏灌輸文化渣滓中的那種審美標準。

世界上沒有別的地方使廣播節目獲得着像蘇聯一般高尚的水準。當我病臥床上時，一天會有十二小時收聽廣播，一小時一小時的節目中有卓越的音樂演奏，許多有趣的演說，集體農場農民的節目，蘇聯兒童要求的節目，莫斯科戲院裏的戲劇，還有我丈夫戲院裏的小歌劇。所有這些都收進了我的房間。大部分日子有三種不同的節目，沒有廣告或低劣的音樂，沒有人推銷肥皂，頭髮補藥，或福特汽車，沒有關於紛亂的家庭生活的聳人聽聞的戲劇，在聽過兩小時後也無須像在美國一樣吞服頭痛丸。

我所要描述的印象只是一些我在蘇聯短時期居留所注意到的事物。

我並不想假充一個像他們在美國被稱呼的所謂蘇聯問題專家，我不想假充什麼，我只是來到蘇聯爲自己了解與熟悉一些蘇聯人民的美國婦女，我所說到的一些事情任何那位胸無存見的美國人或其他外國人都可以在這裏看到與明瞭，而且如果他或她有勇氣來講真理的話可以寫出來。

我在蘇聯相當短的居留時間內所得最深的印象並不僅是生活的某一方面，而是蘇聯整個生活的一個總的觀感。

我感到我現在是生活在比資本主義超過封建主義尤遠地超過了資本主義的一種社會裏。我能親自看到蘇聯是發展方才開始的一種新型社會，而在社會主義下人類進步的境界顯然是無邊無際的。

美國現在生產的汽車多於蘇聯是事實。

可是更重要的事實是蘇聯是文化上經濟上都比較美國在資本主義生長的繁榮年代所發展的更快的步伐在發展。

值得注意的事實是蘇聯是年青，康健而有力，具有不斷生長的一種能力，它是在發展中，而美國是混亂，退化而政治上腐敗，已落入使國家走向毀滅的一些領袖們的手中，重蹈着德國的覆轍。除非它們及時停止，否則這些情形勢將令美國自殺。

最後，一個重要的事實是蘇聯每一個公民不論他在生活中的地位如何，都有權利展望將來，鎮靜地確信每一年他一定比前一年過得好，他是在協助創立一個他的子女，也許是他自己可以看到的人類的新時代。

我因為做了母親注意着我的兒子將生活於怎樣的一個世界，我作爲一個母親，知道了將來屬於蘇聯，我的兒子將過比他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更富、更好與更充裕的生活。我知道他在蘇聯長大後，無須像我一般掙扎，而受到最好的教育；他用不着在景況不好時流浪於街頭去我一個工作，因為雖然蘇聯的敵人要製造這種景況，蘇聯也不會有壞日子；他不會成爲軍火大王與石油獨佔者們的砲灰；他像其他的蘇聯公民一樣，將是一個自由人，一個人類所從未發動過的一個最偉大的進步運動的參加者。

我在蘇聯很快活。我爲我的兒子生在蘇聯而快樂，因爲他承繼的是一份豐富的遺產。我爲我自己而珍視蘇聯慷慨給予的厚遇，但爲我兒子我更珍視蘇聯的這種厚遇。



美國外交官真相

1950年11月再版

基本定價：4.90

京再（2001—4060）